

2023年第6期 总第103期

教育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Education

高校教师与学生专辑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教育文选

高校教师与学生专辑

2023年第6期

总第103期

2023年11月出版

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主编：朱代武
副主编：徐敏 丁晓宇
审校：刘洪全
编辑：曾红燕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南昌路
邮编：618307
电话：0838-5182660
传真：0838-5183805
E-mail：
tsgxjb22@yahoo.com.cn

目 录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教学学术研究：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高阶层次·····	9
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与创新论析·····	15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系统思考·····	21
高校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实施困境与对策·····	28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高校新生适应性研究·····	32
当代大学生高质量阅读： 时代内涵、现实问题与优化进路·····	39
本科生延期毕业现象的透视与解析·····	45
大学生网络社交的危机检视、泛起成因及消解·····	53
社交媒体与女大学生的“理想美”建构研究·····	62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文 / 王传毅 辜刘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明确科教兴国战略在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使命任务，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考量。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支撑，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重要作用。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没有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就难以支撑科教兴国战略的统筹推进。今天的教师队伍水平决定了明天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一、坚持以德为先，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批德才兼备的高校教师。坚持以德为先，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举措。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就提出，“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重点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发布多项重要政策文件，强化师德师风建设。2014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要求高校“创新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健全师德考核”“强化师德监督”“注重师德激励”“严格师德惩处”，培育高校教师高尚道德情操。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突出师德。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同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要求“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潜心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指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要“努力造就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优秀导师”。2021年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完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作用，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引领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素养和业务能力全面提升。

上述政策为建设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奠定了良好基础，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强化，以李保国、黄大年等为代表的优秀教师不断涌现，全国教师队伍实现了量质齐升，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持续浓厚。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应坚持以德为先，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一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师德师风建设必须突出思想引领和政治导向，加强教师队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持续深入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断增强高校教师队伍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二是要强化精神引领，培养教师坚守师德的自觉意识。师德师风培养是由外在规范的“他律”走向内在价值的“自律”的过程，要让师德师风内化为教师的自律自觉。既要强化精神激励机制，在高校的范围内开展师德师风标兵评选活动，形成良好的精神引领和宣传示范效果，又要建立起常态化、合理化、叙事化的文化熏染机制，整合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优良师德文化和优秀典型人物事迹等教育资源，以微宣讲、微视频、故事讲述等可视化方法为载体，定期开展师德师风专题培训，让“有教无类”“以身戴行”“上善若水”“仁爱敬业”等精神品质生动浸润每位教师的灵魂，强化师德师风修养的内驱力和自觉性，坚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的师德师风。

三是弘扬高尚师德师风、培育优良教风、促进和带动优良学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引领性功能，只有高尚的师德师风，才能培育优良严谨教风，教师职业道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导师的业务水平。教风的优劣是影响教育教学质量高低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优良教风是构建积极向上、严谨求实学风的重要力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充分认识到师德师风、教风、学风之间的关联性、整体性、统一性，整体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四是要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教育评价是引导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机制。有什么样的评价导向就有什么样的师德师风。短视主义助长急功近利的师德师风，效率主义评价形成功利性的师德师风。要支撑和保障教师潜心育人、做大先生、研究真问题，必须优化评价机制，切实破除“五唯”倾向，将立德树人实效作为教师工作评价的根本标准，将潜心治学作为典型选树的重要标杆，引导教师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以身示范感染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二、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持续充实教师队伍规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现代化建设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持续充实教师队伍规模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推进。高校专任教师从2012年的149.46万增长到2021年的188.52万人，硕士研究生导师从22.9万人增长到42.4万人，博士研究

生导师从6.9万人增长到13.2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人数占比从18%上升至28%,教师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成为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大国良师”,有力支撑起了新时代教育更高质量的发展。

需要看到的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也将面临供给不足的重要问题。直观来看,近5年生师比逐步升高,2016-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从17.07:1增长至18.37:1,累计增幅为7.6%,年度增幅依次为2.6%、0.2%、2.2%、2.3%;去除高职(专科)院校数据,本科高校生师比从16.78:1增长至17.51:1,增幅为4.4%。这些数据表明,高校教师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高校在学生规模的增长速度,生均教师资源有所降低。

同时,高校专任教师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若保持当前的高校专任教师增长速度,到2035年,将面临29万人至88万人不等的教师队伍缺口。综合相关学者预测,2035年高等学校在学生数将达到5630.32万人至6496.57万人,依2015-2020年的高校平均的生师比(17.7:1)和不同类型学生当量的计算,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将达到259.15万人至298.78万人,考虑到2035年后将有37.95万教师退休,专任教师的需求将达到297.10万人至336.73万人。(见表1)从高校专任教师的供给能力来看,2020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为66661人,但由于博士就职于“象牙塔”外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学术岗位的人数占比仅为50%-70%。假设以2020年水平测算,依赖于国内博士研究生教育所形成的专任教师供给,到2035年约为46.67万人至65.33万人。同时,依据教育部2020年12月发布的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2019年留学回国人数为58.03万人,2021年已上升至100万人以上,其中相关报告显示,留学归国博士占比约为1.8%,若按照全球博士就职高校的平均比例(50%)测算,每年学成归国群体形成的专任教师供给大致为1万人。综上,2021年高校专任教师188.52万人,按当前供给能力到2035年只能新增60.67万人至79.33万人的高校专任教师,还具有29.25万人至87.54万人的缺口。

表1 2035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需求量预测结果(单位:万人)

方案类型	2035年高等教育测算指标	王传毅等 ^[16] (2022年)	别敦荣等 ^[17] (2021年)	梁彦等 ^[18] (2021年)	李硕豪等 ^[19] (2018年)	王广州 ^[20] (2017年)	均值
高方案 (毛入学率=0.75)	学龄人口	8 907.40	8 377.67	8 501.00	8 409.10	9 114.70	8 661.97
	在学规模	6 681.00	6 283.25	6 375.75	6 306.83	6 836.03	6 496.57
	折合在校生数	5 437.51	5 115.76	5 190.68	5 134.85	5 563.45	5 288.45
	专任教师数量	307.20	289.03	293.26	290.10	314.32	298.78
	专任教师需求量	345.15	326.98	331.21	328.05	352.27	336.73
低方案 (毛入学率=0.65)	学龄人口	8 907.40	8 377.67	8 501.00	8 409.10	9 114.70	8 661.97
	在学规模	5 790.00	5 445.49	5 525.65	5 465.92	5 924.56	5 630.32
	折合在校生数	4 716.10	4 437.26	4 502.18	4 453.80	4 825.25	4 586.92
	专任教师数量	266.45	250.69	254.36	251.63	272.61	259.15
	专任教师需求量	304.40	288.64	292.31	289.58	310.56	297.10

① 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1.5+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2+普通本专科留学生在校生数+硕士留学生在校生数*1.5+博士留学生在校生数*2+普通预科生注册生数+成人业余本专科在校生数*0.3+成人函授本专科在校生数*0.1+网络本专科在校生*0.1+中职在校生数+其他(占用教学资源的学历教育学生数,例如成人脱产本专科在校生数)。

② 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每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约6 148人,其中约25.6%不愿意留在美国工作,且自2015年以来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因此,若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假设按照美国2020年的水平估算,每年海外归国博士约为1万人至2万人,考虑到入职高校的比例,基本也与上述估算接近。

面向2035年建设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必须储备充足的专任教师队伍。

一是做大教师规模增量。需要适应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紧迫需求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形势,根据教育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合理核定高校专任教师编制,以不低于高校在校生规模

增长的幅度，增加高校专任教师编制增量。同时，按需稳步扩大国内研究生教育规模，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持续提升专任教师“内循环”供给的质量与水平，以未来教育强国的教师水平培养当前致力于学术职业的博士研究生。

二是优化教师队伍存量。在现有编制总量内，优化事业编制存量结构，将编制更多地向专任教师队伍倾斜；建立高校教师编制省级统筹的调节机制，在本省范围内解决编制结构性不足问题；探索有效的延聘方式，增加教师总量，对于学术精湛、身体健康、富有热情的退休教师予以延聘，发挥余热、贡献力量，为青年教师成长传帮带扶；创新教师聘用方式，坚持编内编外同工同酬，畅通编外教师发展通道，激发更多高层次人才积极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热情。

三、加大统筹支持和资源共享，促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 and 协调发展”。现代化建设依赖于区域人才合理布局和创新发展的要求，对高校教师的区域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中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良好局面。”加大资源统筹布局和倾斜支持，促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是国家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振兴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2013年2月20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在高层次人才计划中优先支持中西部高校，实施中西部高校骨干教师到东部高水平大学研修访学等重要政策。“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实施“一省一校”和“一校一案”。同时深化对口支援工作，119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参加支援103所中西部高校，实现西部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高校教师队伍不充分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教师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在区域之间分布非常不均衡，院士、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少数省市。从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来看，东部地区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22.70%，2020年增长至35.29%，增长了12.59%，其中北京从48.69%增长至68.14%，增长了19.45%；中部地区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13.94%，2020年增长至22.55%，增长了8.61%，其中湖北从19.15%增长至31.65%，增长了12.50%；西部地区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12.97%，2020年增长至21.98%，增长了9.01%，其中云南从11.86%增长至16.34%，增长了4.48%。（见表2）这表明不同省市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持续上升，且各区域省市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的增长率均值有均衡化趋势，西部增长率高于中部、中部增长率高于东部。这表明尽管区域差异依旧明显，但中西部地区的师资队伍素质提升显著。

表2 普通高等教育专任教师学历结构变化分析表

地区	2012年 专任教师(人)		2020年 专任教师(人)		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				
	合计	博士	合计	博士	2012	2020	增长	增长率	
东部	北京	60 852	29 631	74 138	50 516	48.69	68.14	19.45	39.93
	均值	59 045	13 406	73 862	26 063	22.70	35.29	12.59	55.41
中部	湖北	80 665	15 446	88 750	28 093	19.15	31.65	12.50	65.31
	均值	56 637	7 893	70 817	15 968	13.94	22.55	8.61	61.80
西部	云南	31 322	3 714	43 396	7 093	11.86	16.34	4.48	37.84
	均值	28 142	3 649	35 495	7 802	12.97	21.98	9.01	69.52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

面向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迫切需要加大资源统筹布局和倾斜支持,促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一是优化国家政策供给,积极引导良性的教师流动。国家各部委可进一步在国家级人才计划投放更多西部省份名额,加大对西部教师的支持;在国家级人才计划、各类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中,单列专项并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优秀教师流入中西部高校长期任职,并承担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已从发达省市流入中西部省市,特别是民族地区任教的高水平师资,在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定期定额投放支持名额,实行重点支持。

二是增强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的自我造血能力,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层次人才。一些研究显示,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以外部流入的博士充实师资队伍,存在较大难度,但本省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具有一定比例能够留在本土贡献力量。因此,增强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的自我造血能力,关键在于立足本土、因地制宜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倾斜布局,也可通过多校联合共建的方式,在若干条件基本具备的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博士点共建试点。

三是强化省级统筹,促进省内优质教师资源的共享共用。充分发挥省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辐射作用,综合考虑地理临界性、专业匹配性等因素,将“双一流”建设高校选派教师支持省内普通高校,特别是地市城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建设高校和学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指标,引导建立形成省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共同体。

四、创新高水平师资引育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高水平师资是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指出,“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引育高水平师资,是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引才育才政策,为持续提升教师队伍水平、筑牢人才高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先后实施多项人才政策,吸引了一批国际顶尖科学家来华任

教，培养了一批立足本土、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承担国家重大工程的高校教师。国家积极支持留学进修、访问学者、联合培养、项目合作等方式开展国内外高校教师的学习交流。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累计派出18万余人，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选派高校教师、博士后海外访学1.7万余人，对提高人才创新能力、增强人才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必须进一步创新高水平师资引育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要创新引才方式。要在项目引人、待遇引人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事业引人的方式。集中力量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筑巢引凤”，让有使命感的教学科研事业发挥引育高水平师资的功能，吸引全球优秀教师来华任教。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资源汇聚功能，牵引、带动多方面的创新，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在前沿科学和产业共性技术领域吸引一批世界范围的顶尖科学家来华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关键科技问题研究。

二是要优化育才方式。要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各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教师，大力支持青年教师甘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要营造宽容的容错氛围，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用人育人方式，不求全责备，允许失败、宽容失败，支持青年教师在磨砺中成长。要敢于向青年教师压重担，把青年教师推上教育科研事业的大平台，在承担国家重大任务中历练成长担当。

三是要优化评价制度。不论资排辈，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依据不同类型教师建立分类评价机制，鼓励教学型教师上好课、做好教学学术，在课堂教学上出经验、出思想；鼓励科研型教师潜心科研，聚焦一个领域持续耕作、久久为功，产出原创性、引领性贡献；鼓励社会服务型教师主动面向社会需求，加快成果转化和智库支撑，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开放办学汇聚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的教师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在2020年7月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在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推动产教融合方面持续创新、统筹推进。一大批应用型本科高校坚持开放办学，聘任行业专家在高校担任产业兼职教师，且承担专业课讲授工作。目前正式聘任的产业兼职教师中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占较大比例，2012年普通高校聘任校外教师31.05万人承担专业课讲授，其中“双师型”教师为6.43万人，2020年普通高校聘任校外教师47.41万人承担专业课讲授，其中“双师型”教师为10.23万人，增幅显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专门针对普通本科院校聘任产业兼职教师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不同省市、不同高校之间虽有差异，但产业教师承担任务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设计学生培养方案、开发教学资源、承担实践课程教学，协助指导创新创业与实习实践，其中被聘为研究生导师的产业兼职教授还指导研究生实践创新研究、学位论文撰写及

专业实践；二是协同高校教师开展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作，与高校教师联合开展教学项目建设、科技项目攻关、研发成果转化，提升高校教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三是推动共建产教融合平台，有效对接行业与兼职高校资源，积极推动校企在协同育人、协作研发、联合攻关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须进一步开放办学汇聚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的教师队伍。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产教融合的战略导向。产业兼职教师的选聘应当以具有研发实力的高校和企业为依托，瞄准国家高精尖缺领域，以重大科研创新项目为牵引，以合作研究为纽带，吸引汇聚一批兼具较高学术素养和丰富创新经验的行业专家进入高校承担育人任务，强化有组织科研的育人功能，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二是精选资深专家，引智聚力协同工作。产业兼职教师的选聘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积极汇聚一批承担重大工程、掌握关键技术的研发者，具有丰富实践创新经验的工程师以及前沿应用技术标准制定者等，在高校卓越工程师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大学生双创实践教育中心等基地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中发挥积极力量。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激发行业参与高校育人的积极性。企业积极性是影响产业教师选聘和产教协同育人成效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持续提升企业参与产教协同育人的意愿。教育主管部门可对推动产教融合贡献显著、协同育人成效显著、联合攻关成果突出的单位予以奖励，倾斜支持政策资源、定期推广典型经验；相关部委应加大对产业兼职教授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企业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产教融合项目以及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的支持，通过有吸引力的税收减免、用地支持和金融服务供给切实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各省市应出台配套政策，加大对本地企业的支持。

六、全面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预备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要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给予青年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博士后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重要制度，博士后群体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今天的博士后就是明天的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博士后制度建立以来，国家先后实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吸引了一批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规模逐年扩大，博士后进站人数由2012年的1.25万人增长至2021年的3万余人，平均进站年龄31岁，覆盖13个学科门类的111个一级学科，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上海“超级博士后”、江苏“卓越博士后计划”、湖北“博士后卓越人才跟踪培养计划”、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项目”等，极大提升了博士后培养质量和国际化水平。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还需全面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师

“预备军”。

一是充实生力军队伍，持续扩大博士后规模。发达国家建有一支规模宏大的博士后队伍，在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上发挥着重要功能。以美国为例，美国2020年在科学、工程和健康领域在站博士后65681人，在职的非教职研究人员（类似博士后，但无博士后之名）29661人，在相关领域授予博士学位33678人，博士后招收人数是博士学位授予数的1-1.4倍。中国2020年招收博士后2.8万人，授予博士学术学位6.7万人，博士后招收人数是博士学位授予数的42%。这表明，中国博士后规模还有进一步充实的空间。

二是提高博士后待遇，创新博士后支持机制。待遇问题是引才聚才用才的重要因素，要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从事博士后研究，就需要提供全球一流的博士后待遇。依据加拿大博士后协会2016年的调查，加拿大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47798加元（折合人民币约24万），英国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60000加元（折合人民币约30万），美国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48264加元（折合人民币约24.2万），且自2009年开始都有显著增幅。待遇的保障需要形成多方协同的支持机制，如加拿大实行了多元主体的支持机制，包括导师、科学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奖学金、省级政府和省级科学基金会、院校或系所支持方式、国外基金等。无论以哪种方式获得的经费支持，博士后的待遇稳定在45000-50000加元，差异不大。美国也建立了多样化的经费支持机制，联邦政府、院校、国内其他机构以及博士后本人均为经费来源，其中联邦政府的支持并非仅包括相关业务部门，而是包括国防部、能源部、健康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健康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共同提供经费支持。中国博士后年薪水平距离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且两极分化较大，可进一步创新博士后支持机制，提高博士后待遇。

三是选聘优秀教师，优化师资博士后聘用机制。师资博士后制度能够为进入高校任教的师资提供两年的培养期、适应期和考察期，特别是针对海外归国的博士生提供适应本土学术环境的相关指导，能够为进入知名大学任教的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同台竞技”的机会，能够为博士后提供两年的全面指导、合作研究经历以及教学经历，还能缓解高校师资队伍的近亲繁殖，促进学术交流。优化师资博士后聘用机制关键在于强化育人机制，而非遴选机制。选聘师资博士后入职教师队伍，应破除“五唯”倾向，不唯SCI，不唯影响因子，着重考察申请人思想品德、学术潜力及现有创新成果水平，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将能否正式入职建立在双方明确清晰的选留标准和契约关系之上，不以淘汰竞争论英雄，形成良好的用人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高校教师队伍，既是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等国家战略人才的集聚区，也是创新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汇集地，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全面优化教师队伍规模结构，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都集聚到教师队伍中来，将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2期）

教学学术研究：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高阶层次

文 / 胡建华

教学学术这一概念在2000年前后引入我国以来，逐渐为高等教育学界所关注，并成为影响大学教学改革实践的一种理念。在本科教育日益受到重视、一流本科教育成为许多大学办学的重要目标、以建设一流本科专业为核心的一批本科教育改革与建设项目陆续实施的今天，重新审视教学学术理念，进一步认识教学学术研究在本科教育中的作用，深入理解开展教学学术研究与促进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

一、大学教学的历史意味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意指大学教师在教学知识、教学能力、教学水平等方面的发展。这样的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命题。

教学作为大学教师的主要职责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之时就已存在，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教学是中世纪大学教师的唯一职责。众所周知，中世纪大学滥觞于知识的传授。中世纪的巴黎、博洛尼亚等城市聚集了一批讲授哲学、神学、法学的学者和围绕在学者身边的求知“听众”。为维护讲授者与听讲者的权益，类似于手工业者行会的组织逐渐产生，教皇、国王的特许状为这些组织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大学即诞生于这样的过程之中。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不仅由于人们的求知欲望，社会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与需求。“10世纪之后，西欧各国的封建制度已基本确立，国家机构逐步完善，需要配备一定数量训练有素的官吏；教会势力日渐增长，需要更多通晓教义、能说会道的神职人员去不断扩大它的影响；日益复杂的法律讼争需要懂得法规、能言善辩的律师、法官，以及治疗疾病、维护健康需要精通医术的医生，这些既促成了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也影响了大学的办学方向和职能。”通过教学传授知识，继而通过教学培养人才，这是中世纪大学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中世纪的所有大学中，所使用的教学方法是完全相同的”，“在所有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中，有两种基本的训练类型，这就是‘讲座’和‘辩论’”。“课堂讲授和辩论是中世纪大学的核心学术活动。二者都是口头的活动，都以书面的经典为基础。课堂讲授和辩论，就像布道和比武一样，是司法-教会性学术秩序的集中体现。”中世纪大学的教师行会拥有授予教师资格、准予教师开讲的基本权力。如在巴黎大学，教师行会制定了学校规则，规定教师资格通过考试决定，文学艺术教师的年龄须在21岁以上，神学教师的年龄须在35岁以上等。中世纪大学的性质特点、知识传授的基本要求等决定了专门知识本身是中世纪大学教师任职的主要条件，有关大学教学的知识、理论以及教学发展，那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

18世纪，延续几个世纪的中世纪大学因其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内容与方法等)逐渐显露出一些颓势。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17、18世纪的大学里“旧有的知识并没有增加，而只是被一再重复，变得越来越泛，越来越滥。人们老想永远在同一块土地上收获庄稼，可是既不耕地又不施肥”。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康德、谢林、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一批哲学家、思想家就大学的本质、大学教师、大学教育与教学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阐述了新的理

论。譬如，关于什么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施莱尔马赫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的优秀青年的思想里激活科学的理念”，使他们在科学的立场上觉察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自己的思考自觉地学习科学的根本法则，从而发展各自的研究能力、发现能力与表现能力。“这就是被称作大学之机构的意义所在。”又如，关于大学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谢林认为：“大学教学具有发生意义上的特殊使命。教师不能像著作者那样只提供研究所达到的结果，而应至少在学问的高级层次展现达到结果的方法。这就是活的教学方法的本质特征。”再如，关于什么样的教师才能胜任大学教育的任务，费希特认为，大学的作用不仅仅是给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学生运用知识的技法(或称“学问的技法”)，因此“大学教师必须精通学问”，“只有自觉认真地研究学问技法，并且对一般学问及专攻领域的学问技法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对学习学问技法的学生进行观察，实施评价与指导”。掌握学问的技法、并且能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问技法，这就是大学教师的本质所在。正是这些思想家的新大学理念构成了19世纪初德国大学改革的重要思想背景，推动将研究引入教学、通过研究进行教学、创新具有研究性质的研讨班(seminar)教学形式的大学改革，从而开启了大学的近代化进程，形成了大学的德国模式。德国大学模式成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其他一些国家大学改革与发展效法的样板。19世纪德国的大学改革与教学实践重视将研究引入教学，强调大学教师必须以开展研究作为教学的基础，使得研究成为与教学同样重要的工作。如此，为后来的大学教师需要常常面对“双重忠诚”的选择、不断处理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二、教学学术研究对于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意义

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与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先后进入了大众化时代。在率先进入大众化的美国，本科教育质量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攻取学士学位而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实际上只有一半获得这一学位”，“越来越多的本科生主修面窄的专业”，“授予文学士或理学士的比例，从1971年的49%降至1982年的36%”，“大量学生已放弃某些传统的文理学科，仅1977年以来，愿意主修物理科学的入学新生的比例就下降了13%，人文学科下降17%，社会科学下降19%，生物科学下降了足足21%”。为此，美国高质量委员会、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等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布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1984年)、《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1987年)等研究报告，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中存在的诸多质量问题，分析了引起质量下滑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提升教育质量的对策思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因素有许多，包括人的因素(学生、教师等)、物的因素(场所、设备等)、财的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等，其中人的因素毫无疑问是最为主要的。在呼吁学生投身学习的同时，教师投身教学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大学教师面临着如何处理教学与研究的“两难”问题。“人们期望教授做学者的工作，开展科研并与同行交流科研成果。教师的晋升和终身雇佣地位的取得都系于科研和著述，而本科生教育则要求教师致力于学生和有效的教学。教师们经常被这些相互竞争的义务撕扯着。”在现实中，“由于大学越来越突出科研，教师们减少了教学任务，把更多的时间投入了学术探索”。卡内基基金会1984年对美国大学的调查显示，“只有8%

的研究性大学教师和19%的博士授予大学教师每周花11小时或稍多一点的时间，从事本科生教学。在研究性大学，26%的教员根本不教本科生”。影响教育质量的教师因素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问题，可能更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大学教学的习惯看法，“人们过去经常地认为，任何拿文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都能教课”。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大学新任教师在开始教学工作之前缺少必要的教学知识学习与教学能力训练，“助教们都是在无人提供建议和指导的情况下，被扔进教室的”。在大学中教师的教学状况一般无人问津，“对终身职位的教授，几乎从来不会有人批评他们的教学工作”。

大学教师的教学状况(包括教学认知与实践样态等)如果说在小规模的精英高等教育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生大量增加，教育质量问题的校园外溢到社会，就到了不得不十分重视的地步了。因为提高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基本前提。“出色的教学是本科教育的中心。教师应该不断地改进自己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这意味着需要‘挖掘大纲’，分析学生们在学些什么；意味着需研究不同的教学方式，以确定各种方式的结果；意味着运用有关学生学习和进展的文献，通报课程环境和课程教授方法的变革。”由此，大学教师的教学发展、即发展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美国众多大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形成了一场“教师发展运动”。在80年代，有100多所大学成立了教学促进中心，90年代更多的大学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这些中心开展多样化、有组织的培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活动。一些专业学会，如美国社会学联合会、美国数学联合会等也参与到大学教师发展运动中，推动实施有关教师发展的项目。

如何提升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不仅需要成立教师发展中心，有组织地开展有关促进教师投身教学、培训教师的教学技术与方法等活动，而且更需要改变人们对大学教学的认识，更新大学教学理念。教学学术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E. L. 波伊尔在《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中指出：“我们相信，超出‘教学与科研’这一老式的、已令人厌烦的讨论框框，给予‘学术水平’这一熟悉的、崇高的提法以更广阔的、内涵更丰富的解释的时候已经到来，这将使学术工作的全面内容合法化。不错，学术水平是意味着参与基础研究，但一个学者的工作还意味着走出科研，寻求相互联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并把自己的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我们的具体方法就是：教授的工作可以认为有四个不同而又相互重叠的功能。这就是：发现的学术水平；综合的学术水平；运用的学术水平；教学的学术水平。”大学教师的这四种学术水平对应着四种学术活动，即探究的学术活动、综合的学术活动、应用的学术活动和教学的学术活动。探究与应用的学术活动结果是形成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联系的知识体系，综合的学术活动结果是形成学科间或跨学科的知识体系，而教学学术活动的结果则是形成与传播知识相联系的知识体系。教学学术概念的提出触及大学教学的本质，为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指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可能性。

三、教学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实施方略

教学学术概念提出之后，教学学术理论研究逐渐深入。教学学术理论研究的重点不仅在于解释教学学术是什么，而且还在于探讨如何进行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关于教学学术是什么，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美国学者李·舒尔曼等人认为：“将教学视为学术的一种，就要不

仅将教学作为一种活动,而且要作为一个探索的过程。教学像其他形式的学术一样是一种成果,这种成果的显露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过程。当教师将工作公开、接受同行评价和批评,并与所在专业社团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时,反过来又加强了自己的工作。这时教学就变成了教学学术,而这些也是所有学术所具有的特点。”公开、交流、接受同行评价与批评,这确实是包括教学学术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在形式上共有的基本特点,各种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不同内容及范式方法上。若要深入理解与把握教学学术研究的内涵与本质,有必要探究其区别于其他学术研究的不同之处。

1. 研究基础的多学科性。教学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大学教学活动,包括教学内容、方法、形式、效果、质量等。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中也有大学教学活动。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群体主要是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人员,而教学学术的研究群体则可以涵盖从事大学教学的所有教师。高等教育学研究主要将大学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大学教学过程的一般规律,形成有关大学教学的基本理论;教学学术研究则着眼于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教学活动,将研究融于具体的教学活动过程之中,形成有关教学质量提升的具体知识。开展教学学术研究至少需要熟悉与精通以下几方面的学科知识:所教课程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是大学教学的内容与基础;关于大学教学的知识,理解大学教学的特点与规律,熟知大学教学的手段与方法;关于大学生学习及发展的知识,理解大学生发展的身心特点、学习特点,掌握促进学生自我学习的内容与方法。熟悉与精通这些多学科的理论知识是开展教学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2. 研究过程的实践性。学术研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任何学术研究活动都具有实践性特征,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不过,教学学术研究正是在实践性方面与其他类型的学术研究有着明显不同。教学学术研究以大学教学实践活动为对象和载体,是在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展开的。如果说高等教育学研究者研究大学教学是身在之外(一定意义上),那么教学学术研究者研究大学教学则是身居其中。在这一点上来讲,教学学术研究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教学学术的研究者,同时又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教学活动的实践者。这是教学学术研究过程实践性的根本所在。教学学术研究过程的实践性告诉我们,教学学术所研究的教学活动是具体的,具有比较突出的个性色彩;教学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有关教学活动的知识是有学科、专业甚至课程之别的,在教学学术知识的推广及应用时应清楚意识到这一点。

3. 研究成果的对象性。学术研究产出研究成果,这是由研究的目的性所决定的,符合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学术研究产出的研究成果包括精神成果,如思想、理论、知识体系等;物质成果,如技术、工艺、产品等。教学学术研究产出的成果,除了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如有关大学教学的思想、理论、知识之外,还有一重要的方面是体现在学生的发展上,即促进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的提升、身心的成长。众所周知,大学教学过程是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构成的,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既是教师传授知识、发展能力的对象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教什么与如何教,更在于学生如何学与学到了什么。因此,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各方面的发展是教学学术研究成果中所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教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对象性。教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对象性是由教学实践活动的最终目标

所决定的。教学学术研究成果对象性的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在开展教学学术研究时始终应该如何将促进学生成长置于重要的地位。

明确教学学术研究的特点对深入理解教学学术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开展教学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从教学学术研究的特点可以得知，大学教师仅仅按照正常的规则进行教学或者从朴素的认识出发实施教学改革，这些活动都难以划入教学学术研究的范畴。如何将大学教学活动提升为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在高阶层次上促进教学发展？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理论素养与方法策略。择其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识读大学教学理论。从中世纪大学至今大学已经存在了900余年，大学中的教学活动伴随着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变化，人们逐渐积累了有关大学教学的认识，形成了体系化的教学理论。开展教学学术研究，首先需要熟悉大学教学理论，深入理解大学教学的特点与规律。在大学教学理论中，有关大学教学过程的认识是最为基础的，什么是大学教学过程，大学教学过程与中小学教学过程相比有哪些重要的区别，理解大学教学过程的本质对于教学学术研究的开展十分必要。学校教学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人类认识活动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在于教师与学生作为双主体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指导下得到知识、能力、身心各方面的发展。学校教学过程的特质随着教育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大学教学过程与中小学教学过程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大学教学过程在整个学校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十分独特。它既是学校教学过程的最后阶段，同时又是学生进入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的准备阶段，也即是由一种性质的活动过程(学校教学过程)向另一性质的活动过程(社会实践过程)过渡的阶段。”因此，大学教学过程呈现出学校教学过程和社会实践过程的相互融合、渗透、渐变和转化，具有专业理论性、独立性、创造性、实践性等基本特点。理解大学教学过程的这一性质和特点十分重要，它为实施“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识读大学生。如前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外延不断扩大、内涵改革加速的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在以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阶段经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迅速发展。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标志之一一是大学生人数的大量增加。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经达到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本科(普通本科+职业本科)在校生人数为1906.03万人，专科(高职高专)在校生人数为1590.10万人，本专科在校生合计为3496.13万人。适龄人口的半数以上进入大学，学生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大学生类型多样化，大学教学必须面对具有不同入学动机、学习经历、学习特点、行为习惯的学生，这是开展教学活动与教学学术研究应该考虑的大学生总体状况。所谓识读大学生，不仅要对学生整体的一般特点有清晰的认识，就教学学术研究的特性而言，更需准确把握参与某一具体教学活动的学生的知识、能力等各方面发展状况。进一步说，开展教学学术研究的教师必须熟知与自己同在一个教学过程中的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这样才能使教学学术研究目标明确，让教学活动满足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

识读大学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师生双方在共同的活动中所采用的办法，既包括教师教的方法，也包括学生学的方法，是教授方法和学

习方法的统一。”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相比，不仅在教学内容上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也是过去所不可想象的。美国有调查显示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已经成为大学教学的常态，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小组合作学习(59.1%)，真实项目教学(55.7%)，讲座(46.4%)，小组项目(35.8%)，密集写作(24.9%)，学生互评(23.5%)，日记与反思性写作(21.7%)等。在大学教学中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尤其是注重促进学生自主、积极学习的方法，这是现代大学教学目的、教学性质以及提升教学质量所要求和决定的。开展教学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对于大学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一般性有深入的认识，而且需要根据所教课程特点、学生特点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并在教学实践中有效地组织运用。伴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教学毫无疑问是数字技术影响较为广泛、深刻的领域之一，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会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产生比较大的变化。因此，如何把握数字技术应用、教学手段更新、教学场景变换所带来的教学过程的复杂性，有效促进学生学习，提升教学质量，这是新时代教学学术研究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要课题。

总之，培养合格、优秀的人才是大学作为社会机构必须承担的首要职责与任务，教学是大学培养人才的主渠道，教师是大学教学活动的主导者，高质量的大学教学需要教师具备必要的教学知识与能力，习得教学知识、提升教学能力是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主要目的，开展教学学术研究有助于发展教学知识，提高教学能力与水平，将教学发展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与教学学术研究的开展不仅需要厘清观念，提高认识，更需要大学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充实组织，完善制度。

(摘自《江苏高教》2023年第1期)

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与创新论析

文 / 卫建国 汤秋丽

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事关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导向，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力支撑点。如何推进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促使教师践行教书育人的根本使命，是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健全和完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破除“五唯”顽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强调要不断改革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突出教师的教育教学业绩考核。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提出，我国教育评价改革遵循“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这一系列政策文件既为新时代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也彰显出国家对推进新时代教师教学评价改革的决心。本研究通过厘清和阐述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的价值逻辑，对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和思考，积极构建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的创新路径，推进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真正促进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的价值逻辑

（一）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多次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立德”与“树人”之间是互通共生、互相联系的关系，二者之间形成教育的内在合力，共同回应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高校教师教学评价问题是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指挥棒，对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性和指向性。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的核心目的是为高校教师的教学提供相应的反馈信息，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发展，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从而推动教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既是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高的有效举措。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提升起到“灯塔”作用，只有创造性地改革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引入正确的评价理念和评价标准，才能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是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需求

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和新征程，更加需要现代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规模、质量、结构和功能等方面更加多元化、科学化和合理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国际化进程等在给我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这就要求在新时代加快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使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良好效果，必须不断推进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必须加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一方面要强调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价值理性，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自身的进步与成长，以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工具理性，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学评价方式和手段，不断丰富教学评价内容，优化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等，提高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不断适应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需要。

（三）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是转变教师教学评价理念的关键抓手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需要不断创新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工具。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理念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改革具有“风向标”的关键作用，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价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价改革方向。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过于强调对教师的甄别、考核和排序，其中比较典型的学生评教制度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为了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学生评教中，绝大多数高校将学生评教作为学生查询成绩或者选课的先决条件；另外，为了让高校教师重视学生评教，学生评教的结果与高校教师的聘任、绩效和晋升紧密相连。这种教学评价理念虽然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定的督导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于教师、学生以及学校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比较明显。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理念“异化”导致了教师教学过于注重甄别和选择，忽视了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忽视了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高校教育评价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只有加快推动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改变传统的结果导向的教学评价理念，树立起“以人为本”的发展性评价理念，才能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正确的、科学的导向，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现实困境

（一）工具性评价过多，教师教学评价的育人功能有偏差

2013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提出了“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指导方针引领下，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功能应该是对高校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以不断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核心价值标准应当是“育人为本”，在构建和优化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体系时，需要坚守教学评价育人理念，充分发挥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育人功能。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导向有偏差，评价指标重点侧重职称晋升和各种资助方面，而对于教学水平和教学贡献的关注不够。这种评价导向过分强调其甄别与奖惩功能，忽视了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改进与育人功能严重欠缺。首先，在国内大多数高校里，高校管理者将教师教学评价作为学校管理的一种方式，只对教师教学任务的完成度和教学课时量这种容易统一量化的评价考核加以重视，使得教师教学呈现出趋同化、表面化和片面化的趋势，忽视了教师和学生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个性需求。其次，在“五唯”评价

痼疾影响下,教师教学评价注重打分、填表、交材料等量化评价方式,并将其作为教师职称评审、评优评奖、项目申报、绩效考核等方面的重要根据,这种功利性的教学评价方式降低了教学评价的有效性和可信度,使得整个教学过程偏离了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的主旨,偏离了教学评价的育人理念。再次,教师教学评价过度重视总结性评价,大多数高校的教学评价一般是在每学期期末举行一次,对教师教学的过程性考核较少,极少关注到形成性评价上来,也忽视了形成性评价所具有的独特的诊断与改进功能。最后,我国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这就突显出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理念上需要关注到对学生的育人功能。学校的管理、教学、科研服务都需要围绕着学生的发展,着眼于学生的发展。目前,大部分高校高度重视教师教学评价中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对其人才培养水平关注较少,同时也忽视了学生自身的学习感受和学习效果,对学生的育人功能有偏颇。

（二）评价内容窄化，教师教学评价难以体现发展效能

教育过程是一个多因素、多主体、多变化的过程,具有周期性、滞后性、互动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复杂性、灵活性和多变性。教学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和实质性是保障教师教学评价科学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内容缺乏全面性和具体性,形式化评价过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互动的过程,高校教师教学评价要充分考虑到“教”与“学”两个方面,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内容重点关注于教师的“教”,忽视了学生的“学”和师生互动方面,只是将教师的“教”和教师的教学实施等一些外部教学特征作为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忽视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感受和学习效果等内部发展特征,这造成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内容的片面化和形式化。二是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内容一般只关注课堂教学,很少关注到教师的教学准备和教学结果,使得教师教学评价内容没有涵盖教学的各个层面;同时,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对学生的指导和答疑、实践教学、教材和案例的编写、教学改革、教学研究、参与教研等与教学有关的具体事务也不够重视。三是近年来高校师德失范行为的频发,促使大多数高校制定了相关的师德评价制度,但是目前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内容仍然是以教学成果评价为主,对高校教师师德评价关注度和重视度不够;同时,由于师德评价很难进行量化和操作,导致一般高校师德评价只是流于形式,严重影响着高校教师教书育人职责的实现。四是在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落实不到位问题,对未达到规定要求的教授年度或聘期不合格处理较少或缺乏,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对教授认真落实为本科生上课产生一定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导致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的激励导向不足,难以真正体现教学评价的发展效能。

（三）多元参与机制不健全，教师教学评价主体参与度不均衡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参与主体已经逐渐多元化,形成了学生、教师、同行、领导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教学评价模式,但是由于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仍然徘徊于行政场域和学术场域之间,使得各评价参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不强,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主体多元化参与机制不健全。第一,我国高校教学评价主体仍侧重以学生评教为主,以相关管理部门监督为辅,在学生评教中,学生是教学的直接受益者,这意味着收集的数据更多,可靠性更高,具有一定

的优势，但学生评教一般采用问卷调查表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表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学院、不同专业以及不同课程的差异性，具有通用性和固定性，同时如何保证学生自觉、真实地评价教师教学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二，在传统管理者的影响下，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对教师教学评价进行规范和管理，将教师教学评价作为规定和约束教师教学行为的重要工具，而教师作为评价的主体地位却处于被动状态，限制了教师学术场域自由性和创新性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此外，由于同行评价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得高校教师之间的互评存在偏好选择、人缘关系和听课评课流于形式等问题，大部分教师无法真正有效参与到教师的教学评价中。第三，领导评价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到教师的课堂教学中，获得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评价参与中，领导评价过于关注教师的教态、教姿、板书设计、课堂纪律等一些表面化、形式化的评价指标，而且领导评价结果也存在反馈不及时、缺乏追踪性等问题，这并不能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因此，各教学评价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作、有效参与，有助于形成多方融入、多向互动、多元共利的评价组织体系，对推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分类评价模式不足，教师教学评价标准缺乏差异性视角

评价标准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准则，既制约着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又影响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标准既是教师教学评价的必要前提，也是开展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基本依据，关系到教师教学评价能否有效开展。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在教师教学评价标准上过于追求趋同化和统一化，分类化的教学评价标准不足。第一，我国大部分高校在制定教师教学评价标准之前既没有进行深入调研和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也没有允许高校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各评价主体参与到教师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中，没有结合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现实发展需求和各教学评价主体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二，在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中未对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教师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不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任务等进行区分，这难以真正发挥教师教学评价制度的激励作用，难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理念的实现。第三，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院系和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及其差异性和多样性，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同时，各院系也没有充分结合本院系专业亮点、教学大纲和课程性质来制定具体化的评价标准，只是遵循统一的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标准。这既难以发挥出教师教学评价标准的指引作用，也限制了学科的专业化发展，严重影响着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积极而有效地实施。

三、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的创新路径

（一）转变教学评价观念，回归教书育人实质价值

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人的发展，不仅需要教会学生学会学习，更要教会学生学会创造。深化新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改革，需要转变教学评价观念，了解教学评价工具与实现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实质性教育价值之间的关系。回归教书育人的实质价值，要坚守发展性评价理念，建立促进教师和学生发展的教学评价体系。这种评价理念从评定学生获得了什么知识转变为学生获得了哪些发展和成长。一是高校应立足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和发展的价值导向，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转变将教学评价作为学校管理的一种方式观念，不断优化教师教

学评价制度，增加教学业绩和教学贡献在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引导教师对教学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切实考虑到教师的个人发展需求。二是要营造激励性、过程性评价的教学评价文化氛围，高校可以通过建立指向明确的成果或行为的教学奖、教师奖、教材奖、课程奖等激励制度，加大对积极投入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的教师给予一定的认可和奖励，增加教师的教学获得感、荣誉感和满足感。此外，要建立过程性教学评价机制，不仅仅局限于每学期期末一次的教学评价，充分发挥过程性评价的诊断和改进功能，以便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情况有更加清晰的了解，为教师教学的改进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三是新时代教师教学评价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才培养和学生发展放在教学评价活动的中心环节，这就需要教师的教学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点获取多少，更要对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加以重视。要转变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评价中的被动观念，提高教师和学生参与教师教学评价制定、修订、完善中的话语权，让教师从工具理性的束缚下解脱，回归教书育人的价值理性，让学生有机会表达出自身对教学的实际想法和实际需求，真正从内心认可教师教学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这一育人评价导向。

（二）完善教学评价内容，突显教学业绩和教学吸引力

教育评价的实质性内容评价是一种旨在反映评价对象实质性特征的评价理念和模式，强调所有评价内容能够反映评价对象本身的特性。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过于关注一些外部特征的形式化评价内容，无法突显出教师的教学业绩和教学吸引力。首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评价内容强调对学生的学习感受和学习成就加以重视，高校要加强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教学评价内容不仅要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实施、教学设计等一些外部教学特征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对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感受和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学习成就的评价，这对激励和吸引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要兼顾显性教学质量评价和隐性教学工作评价，强调对教师教学贡献和教学实绩评价的倾斜，增加对教师参与教研活动、教材和案例的编写，课外辅导、答疑与批改作业，指导学生社会实践和参展竞赛等活动的评价，将隐性的教学工作量纳入教师教学评价内容中，不仅可以充实教师的教学评价内容，对教师的教学吸引力也有重要的指向作用。再次，要建立评价内容明确、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的师德评价，师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素养、学科素养和教学态度。师德评价与教学评价有着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内在逻辑，师德评价内容的设计要提高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综合效应，而不仅仅局限于形式化的师德评价内容。最后，高校要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最低课时要求，落实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以及对其不合理处理的有效执行，这也是教师教学评价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师教学投入和本科生教学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强化评价主体多元，持续提升教学满意度

评价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要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发展需求，让评价充分彰显出多元价值。高校教师教学评价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这就决定了教学评价要遵循多主体原则，积极构建领导、同行、教师、学生等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教学评价体系。第一，优化和完善同行评价制度，提高教师教学评价参与程度。同事的相互观察为学习任务的质量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评价

论,为了避免同行评价客观性的缺失,要建立同行观察和评价培训机制,可以设立为期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同事观察培训计划,以帮助教师明确同行评价标准、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方面内容,捕捉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和典型特征,有利于缓解同行评价存在的偏好选择、听课流于形式等问题,提高教师主动参与教学评价的意识。在同行评价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人缘关系的问题,为了破解同行评价的利益共同体影响,可以逐步扩大同行评价的范围,邀请校内外同行或者国际同行参与到教师的教学评价中,以不断提高同行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第二,学生评教在获取教师教学评价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让学生自觉、有效参与到教师的教学评价中,不仅要采用填写问卷调查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成立类似于学生教学评议委员会的研究机构,定期开展学生教学评议会议,增加过程性评价的次数,让学生及时反馈出对教师教学情况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以不断提升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第三,领导在教师教学评价过程中,存在教学评价内容形式化、评价结果缺乏反馈跟踪等问题,因此,要健全领导评价制度,制定能体现教师教学实绩、教学效果的评价指标,建立领导长效评价意识,通过定期开展研讨会、教学活动沙龙等形式来及时反馈教师教学评价结果以及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共同探讨教学理念、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等问题,以达到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and 教学能力的目的。

（四）建立分类评价标准，进一步彰显不同教学特征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改革教师评价,强调要根据不同的学科、专业与岗位特点对高校教师进行分类评价。分类化的教学评价标准,不仅是教师教学评价的本质追求,也可以进一步彰显出教师教学的专业性特征。一方面建立分类化评价标准,需要树立发展性和增值性理念,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要建立在促进教师和学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提升教师教学获得感和学生学习质量的增值评价。高校在制定教师教学评价标准之前,需要进行深入调研和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鼓励高校教师、学生、同行、专家等多元评价主体参与到教师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完善中,充分结合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现实发展需求和各教学评价主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保证教师教学评价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分类化的评价标准具体可以分为学科差异、教师类型、课程差异等三种不同的视角。由于文科、理科、艺术学科等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既需要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学院的特色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以适应不同学院特征、不同学科建设环境和任务的发展需要,也需要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教学任务和教学经验、不同职位的教师基础上对教学评价标准进行分类,充分考虑到不同教师教学工作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差异性,并且理论课与实践课等不同课程之间的差异性也需要融入分类化的评价标准,以进一步彰显出多样化的教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分类化评价标准并不是仅仅强调学科、教师及课堂之间的差异性,也需要将高校整体发展设计、教师团队发展、学科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联动起来,以激发教师教学活力和热情,引导教师教书育人职责的实现。

（摘自《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年第2期）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系统思考

文 / 武婷 马晓婷

从本质上讲，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发展与其他行业人员的职业发展一样，是一个从单一到复杂行为的连续累积过程。美国职业生涯规划大师舒伯(Donald E. Super)认为，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要经历成长、探索、确立、维持、衰退等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学习任务和选择机遇，前一阶段任务的完成与否会影响后一阶段的任务完成。据此，有人把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化发展分为入门学习、调整适应、成熟稳定和发展创造四个不同阶段，且每个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一阶段进展是否顺利，会影响后一阶段中辅导员的获得感，进而影响其是否选择“辅导员”作为终身职业的追求。本文拟在深入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梳理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研究现状、分析辅导员个体职业生涯的发展特征、厘清辅导员队伍建设与个体职业发展的互动机制，进而从“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出发，提出现阶段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支持策略，形成一个“现状→特征→机制→策略”的研究路径，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现状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有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理论文章逐年增加。自集美大学连凤宝处长在《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第1期发表《谈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后，有关这一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文章不断涌现。为了发现问题、厘清思路、明确研究方向，笔者将这20年来有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研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

(一) 头十年侧重于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理论研究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研究，学者们一开始也倾向于理论研究。例如，彭庆红教授在《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及其扮演》(2004)、《试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2007)和《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能论析》(2009)等系列文章中对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基本职能、专业化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是指形成与完善专门的知识体系、建立专门的教育培训制度与认证体系、建立专门的工作标准与职业伦理体系、发展专业团体并获得专业地位的过程”。刘欣堂、迟沂军在《论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内涵和机制》(2007)一文中指出，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还肩负着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日常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有教师和干部双重身份。要他们向专家型方向发展，就必须在专业化的学科方向、专业化的岗位培训和专业化的素质培养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于是，配备机制、选聘机制、发展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就显得特别重要。陈立永老师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体会，在其《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探讨》(2006)的学位论文中指出：“当前，辅导员队伍还存在着人员数量结构、学科知识结构、学历层次结构以及职称职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必要性显著增强。他认为，在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中应遵循“人本性、实效性、整体性、动态性”原则，通过加强学科建设、完善培训制度、强化职业规范、建立专

业组织、健全工作保障机制，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专业化辅导员队伍。

（二）第二个十年转向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实践探索

经过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努力，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条件，但尚未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加强这支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需要在积极营造舆论氛围、提高入职标准、完善法规制度、加强专业团体建设、改善工作环境和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比如，由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主办的《高校辅导员》杂志2010年的创刊。它既能为高校辅导员展示工作业绩、交流学术成果提供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广大辅导员吸吮精神营养提供了沃土。十年来，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为高校辅导员开展工作、交流思想服务，已成为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园地。另外，在完善理论体系、制度建设、管理机构、岗位培训以及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方面也取得一些新的成果。比如，陈勇博士在《高校辅导员成长路径的阶段分析》（2013）一文中认为，高校辅导员的成长包含社会化和个性化两个方面。他针对辅导员的政治立场、道德品质、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等方面，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论述了影响辅导员成长的社会环境、学校院系环境和班级环境；主张各高校要采取得力措施、分类指导，对辅导员实施成长性考核，引导他们沿着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发展道路快速成长。冯刚司长在《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发展路径》（2016）一文中回顾总结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24号令）颁布十年来，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今后辅导员队伍建设还需要从政策支持、专业归属、职业愿景、文化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和强化，“鼓励更多辅导员实现从被动专业化到主动专业化的转变；通过明确标准引导更多辅导员实现从基础专业化到高等专业化的转变；通过加强培训激励更多辅导员实现从阶段性专业化到常态化专业化的转变，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向纵深发展”。这三个“转变”的实现必将迎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的新气象。

（三）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问题所在与我们的努力方向

总体来看，上述两个十年的研究成果多倾向于对专业化概念的辨析和论证，进而推定辅导员队伍整体专业化的内涵、途径和意义，主要集中在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专业化路径、职业化保障等方面，很少提及辅导员个体方面的成长发展。尽管陈勇、冯刚两位学者对辅导员个体层面的论述有所涉及，但并未深入展开。笔者认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需要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理解，即整体队伍建设和辅导员个体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整体队伍的职业化建设离不开学校的支持、鼓励和政策引导，更离不开辅导员个体在思想认识、心理认同、行为实践等方面的职业认同与养成。因此，本文的价值正在于以此为切入点，坚持系统观念，在关注辅导员队伍整体建设的基础上，把个体职业化过程作为研究重点。然而，这方面正是目前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我们知道，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辅导员这支队伍的整体水平一定程度上是由辅导员个体的素质和能力决定的；要想稳定发展这支队伍关键是要解决好辅导员个体的思想认识和职业发展问题。所以，我们要在总结过去20年甚至更长时期辅导员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规律和特征的基础上，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审

时度势、顺势而上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厘清辅导员队伍建设与个体职业发展的互动机制，进而从“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出发，提出新时代辅导员职业化建设的支持策略，开辟高校辅导员队伍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二、高校辅导员个体职业生涯的发展特征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现象越来越复杂，本质却越来越简单。其中，信息势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组织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内在驱动力日趋显现。这种“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革和创新体现的；从深层生成论的哲学层次来看，又是通过不断提高人才素质而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一“察势者智、顺势者成、驭势者赢”的思想方法，既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为本文探讨高校辅导员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那么，高校辅导员自身如何在社会大环境中，察大势、谋大局，站在时代的更高起点上领略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获得工作的成就感，进而转化为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就成为当今辅导员个人成长的动力源泉，也是新时代辅导员个体职业生涯规划的首要问题。由此，笔者根据职业发展阶段理论和自己的亲身体验将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一）入职适应期：熟悉工作，关注自我修养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高校辅导员队伍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研究生就业的首选岗位。新近入职的辅导员大多是因为对学生工作的热爱和高校工作环境的吸引而来的，一般都具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这一方面在客观上保证了辅导员个体的思想素质和能力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优秀自我”的职前定位与繁杂的实际工作形成了一定反差。所以，新入职的辅导员一般会有“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感觉。这时候的正确引导和关心爱护至关重要。学校主管领导要及时鼓励他们的工作热情，帮助他们减轻工作压力，做好可塑性的引导工作。首先要通过培训或新老结对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学生工作的基本概况、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减少工作的盲目性和不适应感，做好由学生向教师的转化，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其次要政治上引导、生活上关心，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和职业选择，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关注自我修养，做好从被动专业化到主动专业化的转变，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

（二）收获成长期：实践锻炼，提高专业素养

这一阶段是辅导员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初步的实践锻炼，工作能力和思维方式得到提升，逐步熟悉了工作内容并开始萌发工作创新和追求特色的想法，尝试着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工作的被动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工作能力的提升和对绩效的期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从而成就了辅导员成长发展中工作强度最大、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这时候，他们对自己作为大学生的“领头王”、学生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的身份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专业素养获得较大提升。因此，主管领导要充分肯定这一阶段辅导员的主动作为，帮助他们缓解因工作强度大、实际工作绩效及评价与投入度不能完全

匹配所带来的焦虑感或失落感，及时回应并切实解决他们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方法，做好从阶段性专业化到常态化专业化的转变，鼓励他们在实践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推进辅导员职业化建设的纵深发展。

（三）稳定发展期：砥砺前行，开拓职业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辅导员在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和突发事件中更加从容有序。前期的工作投入也开始初见成效，在具体的育人实践活动中办法更多、体悟更深，开始有意识、有能力去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对于大部分辅导员来说，在这个阶段最具激励作用的是学生成长信息的反馈，使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工作成就感以及自信心进一步增强，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内在修炼和职业能力的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个阶段辅导员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会产生一些冲突或矛盾：主观上有较强的职业发展期待，客观上却受到家庭生活负担的拖累，容易产生“成熟性倦怠”的毛病。因此，在这一阶段学校主管领导和院系主要领导要注意帮助辅导员在明确自身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积极进取的工作生活态度，在工作绩效和工作意愿的良性互动中削减倦怠感，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动态平衡，通过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做好从基础专业化到高等专业化的转变，鼓励他们砥砺前行、勇攀高峰！

（四）创新分化期：自我反思，做出理性抉择

从稳定发展到创新分化是系统演化的分岔点，也是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规律性体现。“需要将工作实践思维转换为理论研究思维，难度很大，能否实现这个质的飞跃，是一般辅导员与专家型辅导员的根本区别所在”。通过稳定发展期的职业化探索，辅导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开始理性思考自己是否适合和有意愿继续从事学生工作，走职业化发展的道路。这个理性抉择，笔者称之为自我反思。一个人成长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学会了反思，能够汲取经验教训。处于这个阶段的辅导员，身心发展成熟，思想素质稳定，工作能力较为完备，应该说是一批经过锻炼的成熟的人才资源。他们除了继续在辅导员队伍发展外，还可以胜任很多方面的工作。在这一分岔点，辅导员的自我反思和职业分化是理性抉择，抉择中的挣扎和选择后的期待尤其需要关注。因此，主管领导要站在全局工作和个人发展的视角做好利弊权衡，这关系到辅导员队伍的结构稳定性和个人发展前途，所以要特别慎重决策。

三、队伍建设与个体职业发展的互动机制

一般来说，高校辅导员的个人成长包含个性化和社会化两个方面。以上从辅导员职业生涯的视角，通过有效的实务工作指导和积极的职业目标引领，从辅导员个体的政治立场、道德品质、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几方面，让他们在快速了解工作内容、工作程序、适应工作节奏的同时，对自己的素质能力和职业发展目标进行了分阶段的纵向分析。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任何一个人的成长发展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还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横向分析影响辅导员成长的社会环境、学校院系环境和班级环境，探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个体职业发展的互动机制。总的来看，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政策保障的完善和培训力度的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逐渐优化、目标任务日益明确，辅导员职业化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一）宏观的社会环境迎来了辅导员成长的黄金期

我们党历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的成长。从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设立“政治指导员”到清华大学(1953年)实施“政治辅导员”制度,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我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央将它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几次召开全国性专门会议,相继出台了“中发[2004]16号”“教育部[2006]24号令”等纲领性文件,对高校辅导员的职责、配备、培养、管理和考核做出明确规定。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文件,从辅导员的选拔配备、数量比例、质量要求、专业方向、培养途径和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社会各界对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工作中能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从社会大环境来看,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和个人成长迎来了最好的黄金期。

(二) 中观的学校院系环境是辅导员成长的加油站

我国高校一般实行二级管理体制,学校和院系就成为辅导员队伍的直接领导和管理单位,负责辅导员的选聘、培养、培训和考核等工作。他们对辅导员工作的重视程度、对其职业化发展的具体指导以及对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程度,将直接影响辅导员的职业认同、专业归属、工作情绪和发展潜力。可以说,学校和院系环境对辅导员成长的影响是直接的,甚至是巨大的。如果这些单位的领导能够为辅导员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引导他们努力工作、积极进取,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就能成为辅导员健康成长的“风水宝地”;否则就会影响和制约辅导员成长。几十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哪里的领导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能够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关心辅导员的生活、学习、晋升、待遇等,哪里的辅导员工作就会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也会“水涨船高”——因为大学不仅是给人知识的地方,更是塑造人灵魂的地方,所以笔者将其视为辅导员和大学生成长的“加油站”。

(三) 微观的班级环境为辅导员成长注入不竭动力

学生班级是高校大学生学习生活聚集的地方,也是辅导员开展工作的主要场所。班级的氛围需要大家营造也影响着其中的每一个人。在这里,辅导员与学生的交往最多、关系最为密切,也最容易在这200多人的微观群体中形成一种核心力量。因此,“学生对辅导员工作的认可度、学生成长进步带给辅导员的满足感、辅导员与学生的共同进步等”都将成为一种力量反作用于辅导员。这种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辅导员工作成就感与满足感得到体现的终极保证,也是辅导员工作动力的最终来源和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密切的人际交往中,信息作用的本质就是在这可观测的环境中释放最大的信息量,从而将差别巨大的个性化人群紧密地联系起来营造最大的信息势、产生个人成长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所以,辅导员正是在与学生的共同进步中、在学生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中收获幸福与成功,从而也使自己在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受到巨大鼓舞。

总之,社会大环境的改观、学校各级领导的重视、学生群体的认可是辅导员成长的外在因素;而为党工作、关爱学生、自身努力才是辅导员成长的内在动因。因为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国内外环境,积极发挥辅导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分类指导,让辅导员在不同发展阶段及其不同特点的交互作用中形成螺旋式上升态势。其间,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环境因素正好能够为这种螺旋

式上升提供契合条件，由此形成了他组织促进自组织、自组织影响环境、环境又影响人的超循环互动机制。

四、新时代辅导员职业化建设的支持策略

近年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在党和国家的直接支持和关怀下，规模与质量均得到了长足发展，个体的素质和能力也不断提升，基本步入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轨道。但是，“当一种旧的环境中被输入一种新的因素时，我们将面临的并不是两者的叠加，而是一种旧环境与新因素相互摩擦斗争、最终产生的一种新环境”。当前，我国加快建设“双一流”高校的战略决策正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因势而动、蓄势待发、顺势而为，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出发，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思考、科学设计新形势下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新举措，提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支持策略。这对于充分发挥辅导员对学生履行“思想引领、学习指导、生活辅导、心理咨询等”职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厘清专业归属，制定系统化配套政策

教育社会学家霍伊尔(E. Hoyle)将“专业(profession)”这一概念描述为一个正式的职业，并认为专业化就是一个职业(群体)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成功地满足某一专门职业标准的过程。它内含两个相关环节：一个是作为知识技能提高的专业化；一个是作为地位改善的专业化。长期以来，高校辅导员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一群体的专业归属和社会认同不够，直接影响着辅导员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稳定性。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群体的“劣质地位”导致的。他们平时工作琐碎繁杂、事无巨细，但待遇不高、被人歧视、发展空间又十分有限。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自上而下制定系统化配套政策：(1) 要将辅导员列入学校人才发展的总体规划，不断完善选拔、培养、考核和激励机制；(2) 要建立不同层次的全覆盖培训体系，有效提升辅导员的素质和能力；(3) 要落实辅导员职称职级的“双线”晋升办法，注重实绩，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审；(4) 要畅通辅导员发展通道，激发他们自觉走专业化发展的内生动力，营造积极向上的环境氛围。

（二）创新培训机制，锤炼标准化职业能力

近年来，辅导员岗位的吸引力有所增强，人员的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学历层次日趋合理，但由于辅导员工作的直接性、事务性等特点，使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自身的学习和能力的提升。因此，辅导员的专业化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劳凯声教授指出：“专业区别于一般职业之处在于从事这一职业所需的专门技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性质，这些性质是通过一定的标准来衡量的。”为此，教育部[2014]2号文件明确指出，“高校辅导员是履行高等学校学生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并以“能力标准”的形式对辅导员的学科知识、专业能力、职业素养、从业规范等做出规定；对其工作内容和能力要求也进行了原则规范。在随后的落实中，教育部结合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辅导员培训的效果导向和政策支持，丰富了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启动了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出国访学、评选年度人物，还设立了辅导员研修基地、骨干专项课题，等等。这一切大大缓解了辅导员的思想困惑，为锤炼辅导员的标准化职业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健康成长，将自身职业能力的提升转化为“实现职业理想的自觉追求”。

（三）完善考核制度，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

当前,高校辅导员实行学校、院系双重管理,具体由院系党委(党总支)负责本单位辅导员的直接管理;而由学工部牵头负责全校辅导员的培养、培训和考核等工作。这一作法目前还存在一些管理上的困难,迫切需要学界和各高校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让辅导员“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是提升辅导员科学化管理的主要目标。(1) 要提升管理水平。从“管理就是服务”的视角明确所有管理者的工作理念;学校主管领导要把控全局、协调结构关系、优化系统功能,为辅导员个人素质的提升和职业化发展提供管理保障。(2) 要完善考核制度。学工部作为学校辅导员的主管部门,要在尊重院系考核标准的基础上,将辅导员的专业能力和育人实效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同时要加强顶层设计,理顺工作程序,通过绩效考核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肯定和鼓励,尽可能为其提供发展晋升通道。(3) 要构建协调机制。高校辅导员入职前专业背景不同,入职后工作繁忙、内容繁杂,培训要求又很高,所以要着力研究辅导员管理中的差异性,运用系统思维探寻其规律性,主动干涉负面的涨落现象,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机制,持续推进辅导员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四) 明确职业愿景, 开通层次化流动机制

“职业愿景,是指个人关于工作的偏爱和向往,是对未来与职业目标相关的理想环境的期待。它影响自我观念的形成、对机会的把握能力以及对职业的兴趣和希望等”。当前,我国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对于广大高校辅导员来说恰逢“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所以,各高校要抓住时机、顺势而为,做好辅导员的思想工作,坚定他们走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道路的自信。首先要分类实施成长性培养。“人是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工具”。康德的这句名言是说,人类只要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就很容易通过共识而建立道德律,并能在有限时间内获得不断进步。所以,辅导员个体要根据自己的能力特点和专业兴趣不断做出理性选择;而学校要实施以人为本的成长性培养方案,帮助他们逐步明确自己是走专家型还是走管理型辅导员的发展路径,并提供发展建议和转岗培训。其次要开通层次化流动机制。因为任何系统的演化在临界点都会产生非线性分岔和非平衡相变,所以人的成长也会形成一些分化。对于辅导员来说,由于岗位竞争激烈,发展机遇同付出的努力又往往不能匹配。这就需要学校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开通层次化流动机制,统筹资源,查漏补缺,公平公正地为辅导员提供竞聘上岗机会,让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

(摘自《系统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

高校辅导员“教师职称” 晋升实施困境与对策

文 / 孙留萍

一、高校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该往何处去

高校辅导员（以下简称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一线工作，肩负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使命。目前，职业发展空间小和角色身份不明朗引起的辅导员职业倦怠和人员流失是高校辅导员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各高校纷纷出台并落实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旨在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正因如此，“教师职称”晋升有效契合了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度肯定了辅导员的教师身份，为辅导员提供了职业发展的双重机会，是确保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教师职称”晋升存在科研标准高、学生工作业绩权重不合理等与辅导员的工作特征不匹配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形成了辅导员晋升的双重困境，辅导员队伍提质增效的初衷未能有效实现。

从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辅导员“政工干部”身份的基础上，2006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首次明确提出“辅导员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以及“专职辅导员可评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或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技术职称”。随后，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推进落实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尤其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更需凸显辅导员的教师身份及育人功能。2017年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辅导员的“双重身份”，并强调各高校要制定专门办法和激励保障机制落实“教师职称”评聘。2020年4月22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再次强调：“建立职级、职称‘双线’晋升办法”。可见，国家始终高度重视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的落实。然而，尽管在政策上明确了辅导员教师身份与评聘要求，该政策在高校的落实情况依然不够理想，存在晋升制度缺位、辅导员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内容边界不清、科研能力和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

目前，针对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的已有研究更多是基于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且是从属于“教师职称、管理职级”双线晋升框架下进行的笼统分析，未有专门就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的研究，尤其未从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角度探讨“教师职称”晋升实施的困境。基于此，本文结合全国96所高校的调研，从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执行主体高校、执行对象晋升制度、执行结果晋升结果和执行客体辅导员四个维度探讨“教师职称”晋升执行现状及困境，以期为推进“教师职称”晋升由“最后一公里”到零距离提供参考。

二、高校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实施的现实困境

本研究编制了《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实施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分为基本信息、“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出台情况、落实情况、结果运用情况、辅导员自身晋升难点五个部分，并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培训期间进行了问卷调研和线下访谈，

通过问卷星收集到26个省份96所不同层次、类别高校的96份有效数据。总体来看，“教师职称”晋升存在执行主体高校的执行力不足、执行对象晋升制度的适切性、执行结果的异化和执行客体辅导员能力欠缺四方面问题。

1. **高校出台晋升制度不足和关键点位落地不够。**首先，学校层面“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出台是基础。然而，“教师职称”晋升配套制度的缺位、错位是当下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查显示，有10%的院校还未制定专门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其中包含5所本科和5所专科、民办和职业院校。其次，制度的执行是关键。已出台制度的高校中，仍有22.34%的高校并未真正落实执行该制度，受访辅导员也提到“制度没有执行和执行没有连续性”是一个显著问题。也有部分高校并未制定正式的成文制度，但实际进行了评聘晋升，评聘标准只规定了工作年限等简要条件，符合年限的辅导员去竞聘，通过评委打分或者商议确定晋升人员。最后，制度的执行是否按照“三单”是核心。已落实晋升制度的高校中，有10%的高校辅导员仍需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老师竞聘，7.14%的高校采用其他方式，如与背景学科相似的科研教师一起评聘。教师职称命名也存在差异，23.40%称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74.47%称为副教授和教授。总体来说，作为执行主体的高校，制度出台的刚性要求与落实过程中的弹性执行形成了鲜明对比，“无章可循”“有章未循”和“循章不严”等执行力不足的表现严重影响了晋升制度的实效性。

2. **晋升制度的科研考核标准与辅导员工作缺乏适切性。**目前，各高校将辅导员的科研成果与“教师职称”晋升相挂钩是普遍的制度性规定。对51所高校“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实施办法”的文本分析得知，晋升标准一般包括基础条件（学历学位、工作年限等）、师德师风、学生工作业绩、科研成果四方面。问卷结果显示，分别有60%和55.71%的辅导员认为科研成果要求高和评聘标准缺乏对学生工作性质的考量是现下晋升制度存在的重要问题。科研成果作为辅导员考核指标旨在通过提高科研能力反哺实践工作，然而访谈发现，辅导员的科研成果产出与能力提高不成正比，反而带来了额外工作压力。晋升制度规定了文章发表和课题立项的性质、数量和级别，即晋升与科研成果“挂钩”“设数”“定级”等硬性要求，因此，为满足晋升制度的条件，辅导员不得不在工作的同时始终考虑科研，这使得辅导员科研动机逐渐变成“为了发表而发表”的功利性行为。而且，作为制度环境中的理性行为者，部分辅导员可能会因追求科研成果造成对学生工作时间和精力“隐形挤出”，如减少走访宿舍频率、深度谈话时间等。同时，有辅导员表示“与科研教师去竞争C刊几乎没戏”，而“将工作经验提炼成高质量的工作案例或工作报告更符合辅导员‘学术’成果的特质”，因此，制定适合辅导员工作性质的考核标准，不仅可以解决写文章、发文章的科研焦虑，还能保证学生工作质量。

3. **辅导员晋升成功后作用发挥平台缺失导致逢优必转。**“教师职称”晋升的落脚点在于“升”而非“出”。然而，部分高校将辅导员“转岗”作为衡量队伍建设成效的标准，“逢优则转”成为队伍建设的常态，过渡性、年轻化、流动性成为岗位特征，这严重阻断了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调查显示，对晋升成功辅导员的去向进行排序，“已转岗”得分最高，继续做辅导员次之。关于“转岗”的具体去向，转岗至“机关”得分最高，为2.67；转岗至“科研老师”次之，为1.07。转岗为“科研老师”的多转至马克思主义学院或其学科背景相关院系。一方面，晋升成功的辅导员转岗是因为岗位前景不太乐观，达到“副处或副研究员”层面后即遇到职业

发展“天花板”，达到教师高级、管理处级以上的辅导员凤毛麟角。调查显示，仅26.73%的辅导员认为工作前景十分乐观、认可“双重身份”会带来更好发展机会；余下辅导员都认为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转岗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针对晋升成功的辅导员如何发挥作用，并未进行制度规划考虑。受访辅导员表示，职称评聘成功后依然做之前同样的工作内容、身陷繁忙的具体事务处理中，对个人成长作用不大。因此，部分辅导员将晋升成功的契机作为转岗的敲门砖，用以争取后续的调动机会。由此，晋升演变为辅导员“改行”的依据，出现了“干辅导员”是为了“不干辅导员”的悖论现象。

4. 辅导员个人科研能力不足影响晋升动力。辅导员工作的繁杂性和核心竞争力的缺乏使得晋升存在一定难度。调查显示，高达85.11%的辅导员有强烈的职称评聘意愿，但其中大多数辅导员都表示难以达到晋升对于科研成果的要求，因此，辅导员均表示“教师职称”晋升是“幸福的烦恼”和“矛盾的奢望”，出现“走着看吧”的消极心态。同时，“影响自身晋升因素”的排序题显示，辅导员工作性质造成时间精力少与自身科研能力不足得分最高，分别为6.46与5.13；职称名额有限次之。究其原因在于，晋升的内在逻辑要求辅导员需具有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双重能力，然而，辅导员难以两者兼顾，普遍存在科研能力的不足、辅导员工作繁忙而不能、科研对于工作无意义而不愿三方面的问题。首先，辅导员队伍的学科专业背景多样，而晋升要求的科研成果须是学工类，研究范式的转变给辅导员科研带来一定难度。虽然各高校也设立了辅导员专项课题致力于提升科研能力，但实际运行中存在立项难、重立项轻结项、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因此，辅导员从中能获得的科研能力提升明显不足。其次，辅导员工作具有时空弥散性，晋升的科研要求与日常工作特征的不匹配难以保障科研工作的开展。最后，受访辅导员表示，“做科研只是为了满足评审对于科研成果的要求”，研究成果对于工作的指导意义甚微，这从根本上降低了辅导员科研的动力和热情。

三、高校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的优化路径

基于“教师职称”晋升存在的问题，高校应在理念认识、制度保障、推动落地以及辅导员个体积极作为等层面多管齐下，才能切实推动“教师职称”晋升落地落实落细。

1. 提高高校制度执行意识，推进制度落实落细。“党和国家关于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文件规定和政策供给已基本完备，现在的关键是落实，而落实的关键是高校。”然而，作为辅导员职业发展保障的校级相关制度办法的缺位、错位导致辅导员职业路径受阻是当下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部分高校没有深刻意识到辅导员队伍的重要性，以及运用制度推动工作、破解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不足。因此，高校要加强顶层设计，根据教育部晋升政策要求制定适合本校的晋升制度，尤其是借用学科评估、教育评价改革杠杆作用推动制度落地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导向鲜明地指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评价高校办学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高校应借助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和大力推进，积极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纳入高校教育改革评价标准中，将辅导员晋升纳入人才队伍建设和人事制度改革，从而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从高校改革发展“软指标”成为“硬约束”、由“自在状态”转变为“自为状态”。

2. 制定符合辅导员工作性质的科研考核标准，提高制度的适切性。一个合乎实际的合理制度是“教师职称”晋升落实和执行的关键。当前，“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争议点主要集中于

如何呈现学生管理工作和科研成果的比重。因此，必须探索真正符合辅导员工作性质的科研考核标准，如符合辅导员“学术”特质的高质量工作总结、工作报告、工作案例等列入科研成果范围，让辅导员在完成学生工作的基础上即可提炼出科研成果，这有利于改善学生工作和科研成果“两张皮”的现象。此外，要合理划分科研成果和管理工作绩效的比例，降低科研成果在制度中的强制性，以此减少科研压力对辅导员工作时间和精力撕裂。调研中，某大学考虑到论文发表的难度，可用“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和“职业能力”奖项等来替代论文发表或课题，这对于改变辅导员发表论文的功利心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3. 搭建辅导员职称聘后作用发挥的平台，促进晋升目标回归。诚然，合理的人员流动能够使辅导员队伍充满生机和活力，但就具体行业来说，优秀者应是在该岗位内向更高级别晋升，而非转岗离开本岗位。目前，在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期待和辅导员队伍低稳定的情况下，高校不应鼓励辅导员转岗，而是要搭建辅导员“教师职称”职称聘后作用发挥的平台，以此激励辅导员长期从事学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职业高峰。例如，可采用辅导员科研工作室立项的形式，让评聘成功的辅导员发挥优势组建科研团队，一方面聚焦学生工作中的具体研究方向产出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完善工作室管理制度，将辅导员参与工作室情况与学校的年度培训、日常考核打通，在不额外增加辅导员工作培训任务的同时不断提高其科研能力和成果。

4. 辅导员个人内涵式发展，提升晋升动力。辅导员的职业发展不仅要靠自上而下的外在政策推动和制度设计，更有赖于辅导员个人内生的职业成长动力。工作和科研的协调是辅导员必须直面的问题，在日常事务管理工作中提炼科研成果是关键。目前，专业背景多样化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素养不够以及辅导员精力局限于学生事务工作，“重实务工作、轻科研工作”以及“不愿”“不会”进行科学研究的现象仍较为普遍。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辅导员在学科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两方面提高能力，通过自主学习、培训研修、科研训练等方式强化相关理论根基，并结合个人分管工作聚焦研究方向，对育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探索的解决措施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积极申报自己能胜任的科研项目。尤其是要创造条件在科研时间和精力上做加法，将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凝练升华为系统科学的理论，实现“经验思维”向“理性思维”、“知识吸收”向“知识创造”的转型。

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事关整个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晋升困境不仅由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也有晋升政策实施不合理等原因，清醒认识并不断探索优化举措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内在必然规律和应然进程。因此，辅导员“教师职称”晋升的落地需要整体规划和系统推进，高校应深刻认识制度出台的必要性，确保落实的正确性，制度受众对象辅导员也要共同努力。由此，“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才能真正从制度愿景转化为实际效果，真正发挥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推动作用。

（摘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9期）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高校新生适应性研究

文 / 高迎爽 李崇华 王涛

一、引言

高校新生的适应性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主要包括生活适应性和学习适应性等。其中，生活适应性指的是在新的环境中，个体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有效地调整自我身心状态，从而与新环境相协调。学习适应性指的是个体根据学习条件的变化，结合自身学习需要，努力使自身的学习心理和行为与不断变化的学习条件相协调，并促进学力发展的过程。高校新生正处于高中到大学的关键衔接阶段，需要适应从学习到生活环境方方面面的变化，其适应程度也直接影响大学新生的学业发展和心理健康状况。因此，本研究所关注的高校新生适应性问题，是生活与学习两种适应性的叠加状态，是新生为满足自身需求而与高校这一场域相互调和的过程，最终达到个体与场域环境和谐统一的状态。大学是学生个人学习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面临全新的环境，生活、学习和人际环境发生变化，学生容易产生心理不适感，甚至出现适应障碍。有学者将此称为“大学新生综合症”，具体表现为环境不适应的心理焦虑症、学习不适应的迷惘症、人际关系不融洽的孤独症、情感波动受挫的抑郁症等。典型例子是当前存在的“大二低潮”（Sophomore Slump）现象。

为进一步提升新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适应性，使新生在思想、心理、行为等方面重建平衡，与大学生活达成协调并得到充分发展，诸多高校有针对、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新生适应性教育。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教育模式，最早可追溯到1972年南卡罗莱纳大学开设的新生研讨课（University 101），即适应性转换与学术性转换并举的“U101模式”。高校适应性教育对高校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更好实现自我价值意义重大。目前来看，国内外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新生入学教育。美国许多高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新生入学教育实施“新生头年计划”（The First-Year Experience，简称FYE）；在哈佛大学，每个新生的父母都会被邀请写一封信给哈佛本科生院院长，介绍自己孩子的特点和家长的关注点，以帮助学院更好地服务新生，如搭配合适的室友等；澳大利亚各高校普遍设置了入学教育中心（Orientation Centre）专门机构，构建了以辅导课程为核心的特色入学教育模式。国内高校新生适应性教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的新生教育模式，但仍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效，高校新生适应性问题仍亟待解决。

高校新生入学适应是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个人能够更负责任地处理其经历的一个积极的成长过程”。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到“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因此，新生的全方位适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党和国家对青年大学生寄予厚望，大一新生个体求学道路上关键的转折点，也是人生道路上重要的阶段。因此，处理好高校新生在入学之初的适应性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

二、社会支持与高校新生适应

当前关于高校新生适应性问题的研究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高校新生适应性内涵研究，从生命历程发展的视角，将大学生适应性定义为学习适应、人际适应、生活自理适应、环境的总体认同、身心状况五个方面，认为适应性教育帮助新生在思想、心理、技能等方面达到特定要求，适应大学进而全面适应社会；二是聚焦问题，寻找新生适应性过程中出现的学习适应性、心理适应性、社交与发展适应性障碍与问题；三是基于问题提出对策建议，遵循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思路，提出形成教育合力、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增强创新性、注重全方位、合理规划时间等建议。但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不够深入，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对高校新生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不适应”的表现背后存在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二是不够系统，高校新生入学适应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单一的视角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需要以系统全面的视角进行分析。

社会支持理论为系统解决高校新生适应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视角。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处场域中的社会网络所能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手段的总和，它嵌在持续的社会互动中，构成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支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术语，包括不同的人在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支持方式。目前来看，对于社会支持的概念有三种界定：一是社会支持是根据个体在所处的环境中与他人联系的频率和强度决定的，即个体的社交网络或社会融合程度；二是将社会支持等同于以爱、亲密关系、信任或者尊重为特征的可用性关系，认为其可以作为压力的缓冲器；三是将社会支持定义为在压力情况下，个体可以感知到的帮助，如可依赖的建议、信息和移情理解、指导和支持的评价等。

从社会支持的概念来看，社会支持与适应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一方面，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越能够应对各种环境的挑战，因此对脆弱性群体和适应不良的群体来说，社会支持网络是提升适应性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不适应”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压力，而社会支持在压力的缓解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这已经被诸多研究证明。从压力及其应对的观点来看，社会支持通过保护人们免受压力的不利影响进而促进健康；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自我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社会支持能够通过促进自尊和自我调节来促进健康。

一般而言，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支持（有效的情感帮助）、工具性支持（有形商品和服务或有形援助的愿景）、信息支持（在有压力时，向他人提供信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评估支持（包括自我评估）等。基于此，本研究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结合深度访谈与深入观察结果，在还原当前高校新生适应性现状的基础上，从社会支持主体、客体和介体的角度分析适应不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举措与方案。

三、高校新生入学适应的基本样态

高校新生入学适应的基本样态是生活适应性和学习适应性相互叠加、彼此影响的状态，受到个体所处环境和“个体-环境”之间关系的影响。高校新生的入学适应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影响因素多样且成因多元，需要聚焦“人”本身和“人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去思考。因此，本研究通过半结构访谈和深度观察，与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互动交流，辅之以座谈会和大学学生的“自述”，以期对当前高校新生的适应性基本样态进行完整呈现。本

研究样本数量满足贝尔托 (D. Bertaux) 的建议, 达到15个以上, 也超过了梅森 (M. Mason) 所提出的“质性研究的样本数量平均水平为32个”。通过对访谈对象进行加密处理, 按照其所属院系和性别进行了编码处理。

经过深度访谈和观察, 我们发现当前高校新生的学习适应性比生活适应性更强, 一般能够适应学习环境的变化, 但是在自我规划和未来发展等方面适应性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 高校新生适应性不足, 呈现迷茫与犹豫状态

入学之初的高校新生存在一段时间的不适应期, 呈现出较为普遍的迷茫与犹豫, 缺乏规划未来的意识和能力, 这与苏坦娅 (Tanya Sue) 等人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大学的学习具有极强的自主性, 与高中的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环境和氛围有了明显的不同, 需要大学生自己根据本专业的培养计划, 自主规划学业进度和时间, 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但是就调研结果来看, 当前大一新生的自主性和规划能力尚存在欠缺, 如“没有考虑过之后, 现在才大一, 不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到时候再看吧, 现在就听辅导员安排, 或者跟着室友他们一起”。抱有这样想法的新生不在少数。一方面是因为新生对环境不熟悉,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清晰, 缺少与辅导员和班导师的交流, 致使规划意识和能力欠缺。有受访者表示: “我也不知道未来想做什么, 不清楚感兴趣的专业, 选课就看室友, 他们选啥我选啥。”另一方面, 大学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给予大一新生更多的选择, 再加上现阶段高校新生的认知和心理尚处于发展阶段, 因此在做出选择时存在迷茫犹疑。不少访谈对象反映“大学活动丰富多彩, 各种社团, 我都想参加, 但是时间不够用”。

(二) 学习适应良好, 但定位出现偏差

学习是大学生的重要任务, 调研中发现当前高校新生在学习适应中的表现超过生活适应。不难理解, 在高考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筛选机制中, 被“挑选”出来的高校新生在学习适应上存在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 “内卷”在高校的流行使得大一新生的学习定位出现偏差。“内卷”本意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人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和内耗。“内卷”在高校这一场域的流行主要表现为对“满绩点”“高分”的极致追求。但是学生忽略了自身全面发展、价值观塑造等, 甚至出现个别“精致利己主义”的现象, 如“我选这门课就是因为这个老师给分高”“我想参加竞赛, 这样可以加一些分, 无论是在评奖学金还是最后的保研上”。这一现象是学习初衷庸俗化和学习目标浅层化的反映。这不仅容易将本科变为“后高中”和“前研究生”阶段, 将学生局限于书本知识, 而且忽视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这些学生虽然能够在绩点上取得一定优势, 但不符合高校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人才市场的需求。从长远发展来看, 高校新生的这种价值取向不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人”。访谈中发现, 有些学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没办法, 都在这样卷, 你不追求分数绩点, 你就没出路。”

(三) 生活适应不足, 自我管理能力欠缺

较之学习适应, 大一新生的生活适应能力明显欠缺。自我管理包括金钱管理、时间管理、目标管理、情绪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等内容。目前, 部分高校新生自我管理能力不强, 主要表现为组织纪律性差、自我管理的目标性差、社会责任感缺乏三个方面, 这与埃利奥特 (Elliot) 和佩弗利 (Peverly) 等人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对于刚刚经历完高中高强度管理的高校新生

来说,大学阶段的金钱和时间管理处于“脱缰”状态,加上消费主义等多元文化的影响,网贷裸贷、遭受网络诈骗等现象频发。有学生表示:“之前都有老师或者家长管着,现在没人管了,反而有些不习惯。”此外,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流以及多元价值观冲击,高校新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沦为电子游戏、小视频、网络直播的“俘虏”,“短视频太浪费时间了,经常一刷就是一上午,发现啥也没干”。在目标管理和人际关系层面,部分高校新生往往以“我”为主制定目标,缺乏对周围环境和自身实际水平的正确考量,实现目标的手段重竞争轻合作。独自面对挫折的信心不足,逃避挑战,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遇到阻碍的时候选择放弃等。其思维模式长期停留在依赖父母和老师的阶段,习惯从外部寻找失败原因,最终导致在本应该提升自我的阶段停滞不前。

四、社会支持视角下高校新生适应困境的成因分析

社会支持是指持续的社会集合,在这个集合中具有支持性的他人可以在个体有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信息或认知指导,或给予实际的帮助和情感支持。高校新生群体本质上是社会性群体,其个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他们表现出的适应或者不适均是社会网络中的支持在这一群体的外显。一般而言,社会支持系统这一多维体系包括社会支持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其中,社会支持主体是指社会支持的实施者,对于高校新生来说,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家庭、学校及其他外部支持力量;社会支持客体是指社会支持的接受者,包括所有需要提供支持的个体或群体,本研究主要指高校新生群体;社会支持介体则指社会支持的手段,包括情感支持、友谊建立、物质支持等。

(一) 社会支持主体角度

从社会层面看,当今我国社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教育体制不断革新,大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社会大环境中的功利化、浮躁化等不良因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一方面,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与改革攻坚期叠加的状态还将持续,各种问题还将不断显现,新旧问题相互交织必然会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活动,甚至容易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塑造。且国际局势紧张、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加剧、网络信息治理难度大,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厌世、佛系躺平、及时行乐等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对高校新生群体产生影响。正如一些学生所认可的“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一切都没意义,会想要躺平和摆烂”,也有学生断言“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躺平一定会很舒服”;再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自由至上论”,宣扬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助长了部分难以辨别是非的大学的损人利己、自由放纵的反集体主义行为。

另一方面,社会竞争加剧,给予高校青年大学生更大的压力。大一新生进入这一场域,不可避免地处于压力的笼罩之下。有受访者表示:“现在考研和考博好难,今年考研人数又增加了。”整体压力的增大,对大一新生的适应造成较为严重的阻碍。

此外,高中努力学习得到更高分数的逻辑不适应本科阶段多元的目标。本科教育对“全人教育”“可持续发展”更加重视,就业时也强调多元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本科阶段,应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他们多样化的技能与素质。中和大学两个相邻的阶段不同的要求和目标,容易对高校新生的适应造成障碍。不少受访者表示,“这和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很不一样,高中

老师总说到大学就轻松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需要学习的东西和技能太多了”。

（二）社会支持客体角度

在高校新生入学适应困境这一难题中，社会支持客体即为高校新生。新生这一群体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新生角色面临着进一步社会化的任务，也处于从家庭、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高校新生不仅仅要面临高中到大学身份的转变，面临生活环境的变化，还需要面临从“纯学习”到“主动学习各项技能”的变化。此外，高校这一场域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跳板，融合着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元素。诸多变化让新生适应面临挑战。不少学生表示，“进入大学就算半只脚踏入了社会，和高中完全不一样”。

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大学生心理认知具有矛盾性，心理发展基本成熟但是又尚未成熟，情感丰富但是缺乏社会阅历以及与别人沟通相处的经验，正处于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所描述的人生八阶段的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时期，充满激情并对世界充满好奇，急于融入社会但是又难以处理复杂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冲突和现实。如有人说道：“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去闯，去跌跌撞撞，去受伤。”这表现出来就是高校新生的“适应”与“不适”的现象。以“00后”为主的高校新生长于网络时代，信息获取便利，社会经验不足，独立性、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其心理特质是开放与封闭并存，社会性与个性化交叉，由此在面临陌生的环境时，容易产生不适应，并产生心理防御机制中的退行性行为。

（三）社会支持介体角度

社会支持介体分为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以社会支持客体的需要为确立依据。从物质支持看，高校新生适应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物力、人力投入不足。在大学入学之前，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不清楚自己兴趣与未来发展的情况下被动选择大学专业，因此在步入大学之后难免对自己的专业、学校或者学校所在城市产生负面情绪。入学之后，大部分新生教育时长仅为2周，且主要内容以讲座为主，高校重视度不够。在现实中，入学教育常常被看作单纯的学生工作，具体由辅导员、班主任组织实施，原本全校的“一盘棋”却成了学生工作者的“独角戏”，难以真正对新生起到指导作用。

从精神支持看，一方面是高校新生适应过程中社会提供的精神支持不足。高校新生进入大学后远离父母、告别高中同学，面临着学习、衣食住行以及语言等方面的新环境，容易步入情感真空地带。与高中相比，高校新生能够直接与班主任或辅导员交流的时间相对较少，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碎片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近一半的大一新生与老师的交流频率是一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次。访谈中也有学生表示“现在没有人每天管我，我和班主任交流每学期就一两次”。因此，无论是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高校新生的情感寄托面临悬置，部分内向学生容易走向自我封闭，一时难以适应高校生活。

由此可见，社会支持介体作为社会支持网络发挥作用的桥梁，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然构成高校新生适应过程中的阻碍。

五、基于调查研究的政策建议

从社会支持理论出发，高校新生适应不良是社会支持网络下主体、客体、介体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支持的本质是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因此需要从高校新生所处的场域入手，锚

定他们在所处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位置，对症下药、系统管理，由社会、家庭、学校多方共同施治，精准施策，完善社会支持网络。

（一）以文化人，系统营造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

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从宏观社会的角度营造适合高校新生健康积极发展的社会环境。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物质条件相对优渥的今天，高校新生适应不良问题、大学生群体的诸多不良倾向，应先从精神层面考虑。对此，要正社会思想之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贯彻到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创新主流文化传播方式，以先进思想浸润社会、以文化人。同时还要拔腐朽思潮之根，加大网络舆论监管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其次，高校新生适应困境的解决应当未雨绸缪，提高人才培养的连贯性与可持续性。一是完善各教育阶段的衔接工作，如在高中阶段建立权威的专门机构，学校在文理科分班（新高考选择学习科目）、志愿填报等关键环节提供专业指导，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多方协同助力学生做出合适的选择；二是职业规划教育下移，将职业规划教育、理想教育、心理素质教育等贯穿于教育的各个阶段，可通过设置职业认知课、自我认知心理课、劳动教育课，建立学校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引导学生从小客观认识职业和认识自己，避免大学生群体远距离观察职业，用幻想把职业美化成人生至高无上的东西。

最后，缓解大学生过早的生存焦虑是改善高校新生适应不良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重视做好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工作。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社会层面的就业支持可从就业容量和就业质量两方面入手。一是政府引领、高校带动、社会协同共同创设岗位资源，用足用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等政策资源，将高校学生就业难和地方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完善地方政府就业服务平台，多渠道加大岗位供给；二是创新大学生就业方式，鼓励创业，积极创立并实施“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目，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利用好所学知识，实现充分就业。

（二）以人为本，全方位打造高校新生支持体系

构建高校新生支持体系是从高校这一场域提升新生适应性的有力举措。高校管理者应提高对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将如何引导新生更好适应大学生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融入集体列入课程。首先，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组建专门研究小组调研掌握高中教育特点、了解学生需求，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可衔接的新生入学方案。其次，丰富新生入学教育内容，形成囊括军训、制度教育、专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介绍、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等内容丰富的入学一条龙教育。再次，坚持以创新性思维丰富新生入学教育形式，典型范例是中国人民大学向新生发放《时间管理手册》，推出“励学人大”专项计划，为新生提供“一对一”学业咨询、“手拉手”课业辅导、主题团课定制等学生学业发展支持项目；四川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校针对不同学科与专业开展分类教育。此外，在完善有温度的、硬核课程的同时应使新生入学报到彰显对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教育意义，做好新生入学服务、新生家长服务以及贫困生帮扶服务。

高校在实施本科生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的教育基础上，还要高度重视通识教育、文化教育以及社会情感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厚植爱国情怀。这就要求所有高校工作者注重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的大局意识，加强学科思政和课程思政建设，把立德树人、“三全育人”落到实处。

高校课程尽可能贴近新生现实需要，提升“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生创新创业”等课程质量，让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引领下认识世界、合理规划人生。在机构设置上，高校可尝试牵头设立学业发展指导中心，将大学生的规划教育前移至高中阶段，使学生提前思考专业、自身兴趣与特长、自身禀赋。课程内容可包括识读大学、识读社会、识读职业、识读自我等。此外，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鼓励学生创办社团、开展社团活动，悉心准备运动会、毕业典礼、开学典礼、元旦节日等，切实让学生在丰富多样的活动中感受人文熏陶，培养锻炼公共意识与志愿精神，增强集体荣誉感。学生抗压能力的培养也不容忽视，因此，学校应定期组织学生体育锻炼、开展辩论比赛、座谈会等抗逆力训练，从身体素质和心理韧性层面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三）多元协同，共建家校社协同支持网络

和睦的家庭、团结的班级、和蔼的老师、友善的同伴都是学生阶段重要的微观社会支持因素，也是处于适应困境的高校新生迫切需要的情感支持来源。因此，共建家校社协同支持网络是全方位提升高校新生适应性的关键。家庭作为学生思想孕育的摇篮，减轻高校新生不适应的关键是避免学校和家庭的割裂。创建家校共有网络加强学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让家长在了解子女所读专业情况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家长期望、学校期望、学生期望三类目标的协同。

提升高校新生对大学班级的集体归属感是预防和改善高校新生适应不良困境的关键抓手。具体措施包括班主任定期召开班会，班级组织开展研学团建，班委组织引导创建班级公众号、创作班歌等，定期在班级活动中持续开展感恩教育活动训练，如给自己感激的人发邮件，每天讲让自己感恩、感动的事情等不断增强高校新生的情绪感悟能力，进而在锻炼学生讲故事能力、有效沟通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情绪价值，确保全体班级成员始终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和参与感。此外，班级抱团式的团体辅导是值得在新生中推广的新型适应性辅导模式。

大力发展高校朋辈教育、引导高校学生自我教育是加快高校新生适应大学生活的最直接途径。朋辈教育是具有相同背景或是由于某种原因使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以实现教育目标的教育方法，如建立以优秀硕士生作为本科生导师的生活导师制，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大学生活对本科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建立学生辅导员制度等。

（摘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当代大学生高质量阅读：时代内涵、 现实问题与优化进路

文 / 刘芳

阅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活动，也是人对信息、知识、智慧、生命、世界的思考活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2014年以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十年对全民阅读活动作出重要部署。推动全民高质量阅读，是建设书香社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途径。

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而高质量阅读，是大学生提升综合素养、掌握核心能力、锻炼过硬本领、勇担责任使命的重要基础。然而，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生被碎片化的海量信息所裹挟，微阅读、浅阅读、碎片化阅读、茧房式阅读等已成常态，导致批判性不足、创新力不强等问题。

厘清当代大学生高质量阅读的内涵要义，分析当前大学生阅读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对于指导大学生开展高质量阅读具有很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当代大学生高质量阅读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数字化已高度融入并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大学生高质量阅读主要是指阅读内容、方式和效果的高质量。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生高质量阅读的内涵包括经典阅读、深度阅读、主题阅读、互补阅读等。

（一）经典阅读：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

所谓经典，是指具有权威性、典范性、超越性，体现着人类共有思想和价值追求的精华作品。根据“经典”的定义和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大学生经典阅读作品大致有五类：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如经史子集等；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矛盾论》等；三是现当代知名作家的经典著作，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四是西方思想文化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五是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奠基之作、集大成著作，如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等。大学生正处于从“生理成人”转向“精神成人”的关键时期，通过经典阅读可以奠基精神来路和理想去路，延拓知识视野和思维宽度，实现情感构建和思想升华。

（二）深度阅读：回归本质的内在使然

深度阅读是以探索事物客观规律，提升学识素养、理论水平、思维能力等为目的的深层次阅读，它是相对于以娱乐性、即时性为特征的浅阅读而言的一种阅读形式。深度阅读注重过程的沉浸完整性、体验的真实性、思维的灵活和关联性、方法的自我构建性等。通过深度阅读，大学生可以实现阅读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增强对阅读文本的解释能力，自主构建更全面的知识结构；可以提升发散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可以回归阅读本质，增强人文精神和科

学精神，客观理性认识自我和世界。

（三）主题阅读：担当使命的时代之责

主题阅读是指主题出版物阅读。近年来，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出版机构非常重视主题出版物的策划出版工作，如中宣部批复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160种（共申报2240种，获批率仅为7.14%）。严格的遴选、审批和把关，确保了主题出版的高起点和高质量。主题出版物能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讴歌真善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国外交》《强国逻辑》《平凡的世界》等。当代大学生生逢其时又重任在肩，肩负着“追梦者和圆梦人”的光荣使命，经常开展品位高、目标远、视野阔、格局大、责任强的主题阅读，必将对他们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培养大格局、大担当的视野和胸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四）互补阅读：介质变化的必然选择

当前，承载信息内容的介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纸质载体发展到各类数字载体。有学者把数字阅读简单地理解为“浅阅读”，把纸质阅读理解为“深阅读”，这种理解既不科学也不客观。纸质阅读具有文本空间结构散发的书香气息，让人有更深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和理解效果；而数字阅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用户的交互性较强。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各具优点，也各有弊端，要根据阅读的内容、目的等的不同，以及环境、资源的变化，采取不同的阅读介质，即进行科学的互补阅读。如果是较短的文本并且内容非常有趣或有用，如科普故事、期刊论文等，可以优先选择数字阅读；如果是长文本，如经典著作、学位论文等，纸质阅读是理想选择。

二、当代大学生阅读的现实问题

在数字化环境下，丰富的信息造成注意力的匮乏，导致大学生深度思考不够、人文素养缺失。很多大学生除了功利性阅读和娱乐性阅读外，很少进行深度阅读、经典阅读，对主题阅读比较冷漠，背离了真正的阅读价值和文化。当代大学生阅读的主要特征及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阅读价值特征：功利性

当前，大学生阅读呈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倾向，他们大多重视与学业和职业发展有关的阅读，轻视人文和经典阅读。在就业、考研等现实需求下，大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目的性和指向性。大学生功利性阅读倾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基础教育阶段未培养学生科学的阅读素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应试教育影响，学生思想深处一直存在“读有用的书”的价值判断，对看似“无用”的文史哲经典书籍及具有思想政治引领作用的主题出版物不够重视。其二，高校对学生素质能力评价的功利性引导。当前，高校对学生评价主要看学业绩点、英语等级、各类竞赛成绩等，为了获得较好的评价，学生会把大量时间用于功利性阅读，导致很多内容“读完就丢”“考完就忘”。其三，激烈竞争的就业环境迫使学生不得不更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就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主要阅读与考证、考级等相关的实用性内容，鲜有时间和精力用于经典阅读和深度阅读。

（二）阅读内容特征：娱乐性

当前的“网生代”大学生，大多喜欢通俗、休闲和娱乐性的阅读内容。相较于经典作品中遥不可及的“纯粹、理想和美好”图景，娱乐化阅读更能带来精神快感，并极易让人沉湎其中。当代大学生偏向娱乐化阅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缺乏自律。很多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弱，对学业缺乏规划，大量的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如部分男同学沉溺于网络游戏，部分女同学热衷于上网追剧，更有一部分学生深陷“抖音”“快手”等娱乐平台不可自拔。其二，热衷社交。当前，对大部分大学生来说，网络的社交功能已经成为其首要功能。社交阅读以及娱乐化阅读方式的盛行，使很多大学生沉浸于媒介“幻觉”里，与理性越走越远，消解读书兴趣，丧失思想和精神深度，影响心理和精神成长。其三，现实需求。当前，网络信息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大学生的“衣食住行学”等都离不开手机和网络，看似“一机在手，万事无忧”，实则被手机所“绑架”。

（三）阅读方式特征：碎片性

碎片化阅读指利用短而不连续的时间片段进行的阅读，主要是在非固定、零碎化的时间进行，如散步、课前、排队等；或者是长时间进行的随机性阅读，如大学生周末在宿舍玩微信、刷抖音等无目的性的阅读。当前，大学生喜欢碎片化、快餐式的浅阅读，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高校阅读教育引导不足。当前，很多高校缺失系统性大学生阅读教育，学生未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其二，标准化、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未培养起学生探究式的阅读能力。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还是以教师为中心并以灌输性的课堂教育为主，未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意识和求知欲望，学生欠缺主动性、思考性、建设性、持续性的阅读能力。大学生长期沉溺于碎片化的浅阅读，导致思维碎片化，思想和精力不集中，会对他们的全面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浪费了光阴，耽搁了学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在被碎片化的“垃圾信息”所侵蚀。

（四）阅读认知特征：矛盾性

当代大学生阅读存在明显的知行矛盾现象，主要表现为知而不行的问题，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认同阅读的意义，但缺乏自制力。在阅读认知上，大部分学生能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但因为缺乏自制力，没有花费与阅读认知相匹配的时间认真阅读。其二，认同经典阅读和深度阅读的重要性，但又选择功利性阅读。在对阅读内容和方式的认识上，大学生大都认为经典阅读、深度阅读非常重要，但是，因为学业的压力和职业发展的需要，他们阅读的大部分内容为专业教材、职业技能考试用书、考研用书等。其三，认同纸质阅读，但被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所吸引。大部分学生能认识到纸质阅读是阅读的应有之义，纸质阅读有助于提升阅读效果；也能意识到数字阅读容易造成浅阅读和快餐式阅读，浏览无效信息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基于猎奇心理以及无须思考即可满足感官刺激的内容的吸引，往往使很多大学生不能摆脱数字阅读给自己带来的“快感”，存在严重的纠结和矛盾。其四，认同主题阅读的重要作用，但很难坚持读下去。当代大学生从理智上认同主题阅读的重要性，但是基于主题阅读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部分图书“高大上”的话语方式，难以长久坚持主题阅读，往往半途而废。

（五）阅读效果特征：低效性

低效阅读指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阅读，但是效率较低，效果不好。大学生阅读的低效

性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其一，海量碎片化信息阅读后的无印象。大学生对网络阅读乐此不疲，由于缺乏阅读的文本结构，阅读时间和内容碎片化，看似阅读了海量信息，但很多内容“读过就忘”。其二，阅读内容的低质量导致阅读效果的低效性。原创性不足、“标题党”频现的网络信息，以及吸引眼球、快餐式的低俗出版物，往往能满足青年大学生的好奇心理，但是，阅读这些内容会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其三，缺乏阅读目标和规划，导致阅读的无序化。很多学生对阅读缺乏规划和计划，自我管理能力差，导致阅读的无序化、浅薄化和思考的浅层化。其四，大数据推送的定制化信息容易使阅读片面化和极端化。大数据算法的定制化信息推送机制容易使大学生陷入“信息茧房”不可自拔，存在突出的“个人日报”现象和群体极化现象。其五，跨学科和关联性阅读不足，导致阅读的单一性。跨学科阅读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思维广度，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分析和研究；关联性阅读是指在阅读中遇到问题时，延伸阅读的知识触角，获得相关答案和更深层次的阅读体验。从目前大学生阅读情况来看，很多大学生缺乏跨学科和关联性阅读的意识 and 能力，局限于单一学科的阅读和研究范式，很难培养系统性、创新性思维。

三、当代大学生高质量阅读的优化进路

大学生是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重要支撑，而高质量阅读是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方式。大学阶段是大学生阅读的黄金时期，社会、学校、学生要形成合力，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以高质量阅读引领大学生全面发展。

（一）坚持精品出版，提供优质内容

无论是纸质出版物还是数字出版物，出版者都要以“导向正确、思想精深、内容精湛、制作精美”为追求目标，不断提升出版物的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和载体质量，以高品质出版引领高质量阅读。其一，强化社会效益，勇担育人责任。出版机构应始终坚守“社会效益首位”的出版理念，彰显精神和文化出版属性，勇担育人之责，多出“好看耐看”的书，让更多大学生爱上读书，读有所获。其二，树立精品意识，打造优质原创作品。面对大学生对高质量精品出版物的期待，出版人应树牢原创和精品意识，多出深受大学生欢迎的精品读物。其三，贴近学生兴趣，明确出版定位。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观点、新资讯。出版机构要深入了解大学生群体的阅读偏好，在选题策划中主动出击、顺势而为，精准定位、深入耕耘，突出优势、专业发展。出版机构应树立正确的出版理念，如中信出版社“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实施精品战略，传播先进文化”等，致力于出版更多有深度、有思想并广受青年大学生欢迎的优秀图书。其四，加大数字出版，提升阅读体验。数字出版单位要大力提升数字出版物的品质，做到审美和用户体验的统一；要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维护数字产品生产秩序，传播先进文化和正能量。

（二）建设书香校园，打造阅读文化

高校要为学生打造健康、洁净的阅读环境，建设丰富、绚烂的书香校园，引导大学生“好读书、读好书”。其一，打造全域书香校园，为大学生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高校应通过科学设计和建设，让阅读成为校园主流文化。如在教室、活动室、校园景点、文化走廊等，通过艺术化设计，让学习文化、读书文化无处不在。其二，建设书香宿舍，让宿舍成为温馨的阅读港

湾。大学生在校期间多半时间在宿舍度过，宿舍的学习和阅读氛围对大学生成长发挥着关键作用，“学霸宿舍”都是在良好的学习、阅读文化环境中锤炼出来的。学校要大力营造浓郁的宿舍阅读文化，让宿舍成为大学生阅读和学习的重要空间。其三，积极扶持校园书店，让书店成为书香校园的标志。学校要积极采取扶持政策，鼓励校园书店根据当代大学生阅读特点，以高品质图书引领大学生高质量阅读；让校园书店成为学生向往的品书天地和阅读殿堂，进而成为学校的地标性文化场所。如清华大学的“邨架轩”、北京大学的“博雅堂”等，都是深受大学生喜欢的阅读体验地。其四，创建浓厚的人文环境，积极发挥图书馆的阅读主渠道作用。通过对图书馆进行合理布局和精心装饰，为大学生营造宁静且庄严的阅读环境，构筑有内涵和灵魂的阅读空间。其五，加强阅读文化建设，并纳入学校深层价值文化系统。高校要大力打造阅读文化，通过常态化的阅读活动和相关制度设计，使高质量阅读成为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和行动自觉。新时代大学生阅读的本质是启迪思想，激发理性思考，形成健全的人格、完善的知识结构、健康向上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这是阅读的价值原点，也与高校“立德树人”的深层价值文化相契合。

（三）开展阅读教育，掌握阅读方法

自新生入学开始，高校就应为学生补齐基础教育阶段阅读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短板，并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其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阅读观，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阅读观的培养，引导学生摆脱“读书考试”“读书就业”的狭隘认识；要培养学生树立有深度、有品位的科学阅读观，阅读要有明确的目标、不移的恒心，要讲求质量和效率；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即根据不同的阅读内容、媒介、时间和地点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要开展阅读的思维教育，提升大学生对阅读内容的思考能力，避免或减少“浅表化阅读”“无思考阅读”。其二，配备阅读指导教师，引导学生有效阅读。高校要在全校范围内培养、选拔热爱阅读并愿意为学生提供阅读指导的教师。阅读指导教师要及时掌握学生的阅读动态，识别学生的不良阅读动机并加以扭转；对阅读障碍学生要及时开展帮扶，引导他们热爱阅读、有效阅读。其三，开展阅读课程教育，系统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高校至少要开设两个学期的阅读和写作课程并计入学分，建立起“阅读—思考—写作—表达”四位一体的能力培养结构。通过阅读课程，增进学生精读文本的能力，开展有理解力和思考力的讨论，对知识产生好奇，培养批判思维和开放思想，能熟练利用学术语言开展写作和研究。其四，高校图书馆要加强阅读教育引导，强化阅读活动的制度化和流程化。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的阅读推广机构，要开展常态化的阅读推广活动，列出大学生必读书目，引导大学生积极开展经典阅读和深度阅读；还要定期邀请各学科知名专家，以座谈会或专业讲座的形式，对大学生开展专业阅读指导。

（四）提升阅读素养，规范阅读行为

高校要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和阅读素养，规范阅读行为，引导大学生养成阅读自觉。其一，大力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大学生的媒介使用能力。要通过系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让大学生正确认识各类媒介的性质和功能，增强对媒介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考，能在繁杂的海量信息中迅速判断和规避不良信息；能对“信息茧房”造成的信息孤岛有客观判断，不被大数据和算法推送的信息所迷惑；能科学使用各类媒介，不做媒介的“奴隶”。其二，加

强阅读素养教育，提升阅读能力。数字化环境下阅读的资源、途径、方法等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校应强化学生的阅读素养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新媒体阅读的特性，使其掌握数字化环境下优质资源的获取途径和方法，获得更强的学习和阅读能力。其三，处理好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当前，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共同构成大学生的阅读生态，它们的文本介质、内容编制以及呈现方式均有区别，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高校应引导大学生充分利用数字阅读便捷性、互动性的优势，快速获得各类信息；高度重视纸质阅读在阅读广度和深度的天然优势，培养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学会根据不同的阅读内容和场景选择合适的阅读载体，使阅读效果最优化。其四，倡导阅读自觉，提升阅读获得感。读好书、好读书，应内化为大学生增强素质和能力的自觉要求，并把它作为一种习惯和常态，自发、自动、自觉地阅读。高校要让阅读回归其本质属性，注重阅读的人文价值，弱化其工具价值，使阅读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阅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强化经典引领，推动深度阅读

精读经典一部，胜读杂书万种。高校要推动大学生进行常态化经典阅读，发挥好经典阅读的“压舱石”作用；同时，要做好深度阅读和跨学科阅读的教育和引导。其一，要充分认识经典阅读的核心作用，使经典阅读成为大学生阅读的永恒主题。高校要通过通识教育课堂，把中国传统经典阅读和西方经典阅读融入通识教育；要开列经典阅读书目，建立经典阅读室，由阅读推广人对书目进行导读，引导学生“阅读与经典同行”。同时，经典阅读要进课堂、进社团、进活动，发挥经典阅读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作用。其二，加强深度阅读引导，培养创新能力。高校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深度阅读方法，如思维导图法、理解和解释法、批判法、对比法、吸收法等，通过科学的方法，提升阅读效率；还要通过深度阅读经验交流会、读书分享会等形式，营造深度阅读的浓厚氛围。大学生要通过深度阅读，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问题意识的系统培养，提升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其三，加强跨学科阅读，培养整合性思维。交叉融合、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培养将成为高等教育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而跨学科、多维度阅读将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大学生不但要读文史哲、经管法，还要阅读政治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培养整合性和系统性思维能力，锻炼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其四，强化主题阅读，培养家国担当。出版者应多关注大学生主题阅读的现实需求，做好产品设计，做到形式上有突破、内容上有创新；采取大学生喜欢的载体形式、设计风格，让主题出版物独具特色，时代感和可读性强，使其人物、故事、道理更可信、可亲、可敬、可学。高校和教师要做好主题出版物阅读的引导，让优秀主题出版物走进大学生课堂。大学生要通过经常性的主题阅读，培养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六）科学规划阅读，做到知行统一

高校要做好大学生阅读的规划和实施工作。大学生要提升阅读自制力，做到知行统一。其一，高校要做好大学生阅读规划，包括阅读目标设定、阅读书目选择、阅读推广人培养、阅读通识课程实施及评价、阅读品牌打造、常态化阅读活动实施等，通过规划的深入实施，提升大学生阅读的效率 and 效果。其二，大学生要制定大学阶段的阅读规划。大学生要结合本人的专业特点和知识短板，确定好大学阶段的必读书目，做好年度、月度阅读计划，并确保计划的有效

实施。其三，大学生要培养高度的自制力，并坚决做到知行统一。大学生要坚决克服惰性，经得住网络的诱惑；减少手机依赖，阅读时坚决放下手机，不被冗杂信息所打扰；付出与阅读价值相匹配的阅读时间，坚持经典阅读和深度阅读；通过广泛的主题阅读，始终关心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其四，大学生要减少功利性阅读，增加人文性阅读。大学生要尽可能减少功利性阅读，在扩展知识、提升素养的人文性阅读上多下功夫，以持之以恒的人文阅读培养深厚的家国情怀。

四、结语

大学生高质量阅读关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国家未来，需要出版机构、高校、大学生共同努力：出版者要坚守责任，提供优质内容；高校要通过书香校园建设，广泛开展经典阅读、深度阅读、主题阅读活动；大学生要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并做到知行统一，充分利用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的优点，科学开展互补阅读。通过高质量阅读，完善知识结构，增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能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进而铸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和担当。

（摘自《科技与出版》2023年第4期）

本科生延期毕业现象的透视与解析

文 / 车淼洁

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素质参差不齐，文化基础厚薄不均，考试不及格人次增多，延期毕业（以下简称延毕）长期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趋势。事实上，硕士或博士延毕已引发较多关注和重视，然而本科生延毕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仍属“盲区”。对于本科生来说，延毕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眼，因延毕而背负的压力并不小。一方面，本科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以来，本科文凭几乎是基础性文凭，不能按时获得甚至无法获得这一基础文凭，将招致自我、家庭、社会多方的质疑和责问，对学生个体的打击力度相当大；另一方面，这些曾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而进入本科教育的“佼佼者”，面临扑面而来的大学适应、课程学习、人际关系、自我实现等挑战，在同学之间的横向比较和今非昔比的自我落差中挣扎沉浮，延毕的事实相当于一记“实锤”，清楚地表明了该生在大学之河中的“沉沦”。

延毕本科生也称为留级生、超学制学生、延长学制学生，是指在规定的学制内不能按时毕业

的本科生。它分为主动延毕和被动延毕。主动延毕是因结婚生子、个人创业、科研计划、躲避就业等原因主动选择。而被迫延毕的原因，除生理疾病、家庭变故等外，挂科、学分未修满、毕业设计不合格等学业问题和心理问题占多数，实乃无奈、无助、无力之下选择的“曲线”，最终能通达毕业还算幸运，通达不了的则面临退学。因此，本科生被迫延毕带来的家庭冲击、高校管理问题乃至社会问题，不容回避，也不能忽视。

那么，本科生延毕现象在当前高校内达到怎样的程度，具有多大规模？延毕本科生究竟是怎样一群人，有哪些特征，其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观察当前大学生生存现状，进一步理解青年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更有助于反思与警醒青少年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更具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救治和教育工作。

一、与延期毕业相关的理论回顾

梳理国内外文献，与本科生延毕研究最为接近的是对退学学生的研究。美国学者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造成大学生辍学或者无法顺利毕业的原因，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辍学理论。文森特·汀托将学校系统分为社交系统与学业系统，社交系统是包括学生在学校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社交活动的集中体现；学业系统则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课业表现、智力发展等。他将此定义为社交融合与学业融合，当学生无法在学校获得这两种融合时，辍学行为就发生了。

宾和伊顿从心理学视角发展了辍学理论。他们认为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应对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是促进学业融合与社交融合的基本途径。自我效能理论动态地揭示了学习行为的启动和维持主要取决于学生对行为技能的预期和信念，而行为结果又进一步反作用于信念和感知的形成。根据班杜拉的论述，自我效能的实现不是自动化的，成功经验、模仿经历、言语或社会劝说和生理与情绪状态是提高效能的干扰措施。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的辍学研究以简单描述性居多，停留在较低层次的研究水平，经不起方法论的检验，亦缺乏理论上的提升。国内有关本科生延毕现象的研究也是如此，仅有对现象的描述和简单的归因，且对新近几年本科生延毕现状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本研究拟借用国外较为成熟的辍学理论的框架模式，对当下本科生延毕现象进行阐释。

二、本科生延期毕业现状与研究设计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期间，本研究以某省为例，抽取了该省四所不同类型高校，包括省城与非省城、“双一流”建设高校与普通本科院校，通过访谈学校相关部门获取这些高校的延毕情况相关资料。笔者整理发现：（1）大学生延毕的主要原因是学业问题，不同高校均如此，延毕与学业困难密切相关。（2）延毕生最终会有一部分学生无法毕业，学业困难原因为主的延毕生中大约三成左右最终退学。（3）双一流高校的延毕率（本文“延毕率”指的是“当年未按规定学年学制毕业人数”/“按规定学年学制毕业人数”，其中“未按规定学年学制毕业人数”中包含最终毕业的延毕人数、最终结业人数与最终退学人数、仍在籍或仍休学的人数；“退学率”指的是“学年退学人数”/“学年毕业人数”）较为明显地高于普通高校，这与学生培养方案中课程的客观难度具有一定相关性，也与学生多元化的去向选择有关联。详见表1。

表1 某省不同类型高校本科生延毕情况(笔者分析整理)

某省内的高校	延毕率	延毕原因	退学率	退学原因
省城“双一流”高校	12.5%左右	65%为学业困难; 15%为身心健康原因休学; 4%为境外交流学习; 8%为转专业后补休学分; 8%为服兵役、创新创业等	1.8%左右	80%以上为学业困难
省城普通高校	6%左右	97%为学业困难	1.5%左右	大部分为学业困难
省城普通高校	7%左右	94%为课程挂科; 4.5%为毕业论文; 1.5%为参军或其他	2%左右	大部分为学业困难
非省城普通高校	7%左右	95%为学业困难; 5%为个性原因	2.5%左右	大部分为学业困难

为了深描本科生如何在个体意义和过程逻辑上成为延毕生,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希望将个案作为一个观察更多的窗口。个案的选择势必产生代表性或概括性的顾虑。菲利普杰格认为,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误解就是案例研究不能概括世界运行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概括化并非基于数据而是基于分析。分析性概括化是在理论概念和原则的相关性上,超越原始案例而适用其他环境的逻辑。本文正是基于分析的形式逻辑保证案例的代表性和概括性,同时也解释了小样本案例研究的合理性,无论案例多少都不寻求统计学意义,而是专注案例本身的逻辑和分析意义。

表2 某省不同类型高校中延毕本科生典型个案

编号	性别	年级	延毕原因	家庭情况
受访者A	男	2018级	学业困难	家在中部省份某县,父母在镇上开小店
受访者B	男	2018级	学业、心理困难	家在省内某市,父母均为教师,童年有留守经历
受访者C	女	2018级	学业、心理困难	家在沿海某省某县,父亲为医生,母亲为公务员
受访者D	男	2015级	学业困难	家在省内某市,父亲为体制内工程师,母亲赋闲
受访者E	男	2017级	学业困难	家在省内某市,父亲为公务员,母亲为普通职工
受访者F	男	2016级	学业困难	家在中部某省某县,父母离异,父亲为教师,母亲为普通职工
受访者G	男	2019级	学业困难	家在中部某县,父亲为县级医院医生,母亲为教师
受访者H	男	2019级	学业困难	家在东部某省某市,父亲为公务员,母亲在其高中阶段离职赋闲

本研究从上述四所高校中选取延毕本科生的案例,选择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在较多案例中选择了典型个案8人(见表2),对这些个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全部以面对面形式为主,

部分还通过电话或微信语音访谈作为补充。本研究旨在“探索”和“解释”延毕生现象“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即描述延毕本科生的状况、阐释延毕的生成机理、探究如何预防。

三、延期毕业本科生的“沉沦”画像

通过梳理个案发现，延毕本科生有三类典型特征：一是佛系心态。他们没有求胜心，没有拼搏劲，没有目标追求，表现出一种“都行、可以、无所谓”的人生态度。常见于部分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家庭的孩子，从小在家中衣食无忧，依赖性强，既无物质追求，也无远大抱负；有些曾被过度安排，导致并无太多自己的想法。二是丧样状态。以颓废、消极等负能量为核心特征，行为上常身陷舒适圈，沉迷网络、手机或游戏不可自拔，心态上往往遇挫折而自暴自弃、甘于堕落。进入大学以后，失去中学时的优越感和成就感，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失去学习信心与动力。相比佛系心态，丧样状态更加消极，心智、行为呈现颓废、悲观、绝望的倾向。三是病弱特质。一类是自卑、内向、素质能力弱的学生，多为西部、内地、农村孩子，或外在躯体有明显弱势的学生，在大城市的纷繁热闹中无所适从；另一类是人际关系敏感、人格不健全的学生，多数为单亲、离异等不完整或不和谐家庭的孩子，由于没有得到原生家庭较好的滋养，自身人格或心理存在缺陷，因此无法较好地应对大学的种种挑战，从而产生更大的损伤，显现出心理问题甚至神经症、精神病性障碍症状。

延毕是一个逐渐沉沦的过程，如温水煮蛙，起初痛感不强，直到分层愈发明显，他们才惊愕地意识到“沉底”了。为了更直观地表述，本文将沉沦的过程分为六步，参考汀托的辍学理论模式，分别是学业融合方面的变“老油条”、变“逃课生”、变“学困生”和社交融合方面的缺朋友陪伴、缺老师相助、缺家庭支持，导致陷入无力面对未来的窘境（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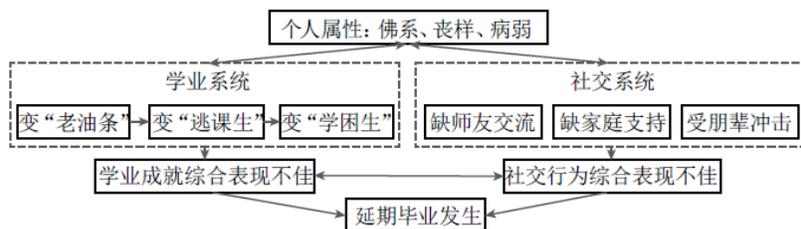


图1 延期毕业大学生的“沉沦”过程

（一）变“老油条”：从新鲜亢奋到放纵自我

对于延毕生而言，刚上大学时他们和大部分学生一样，虽稚嫩但朝气蓬勃，对大学生生活满是憧憬与期待。“大一上学期，我还很有上进心，学习上也是比较努力的，参加综素活动、志愿者、体育社团部长、学院团委，还有入党，也谈了女朋友。一切充满希望，世界之大任我施展拳脚的感觉”（受访者A，2018级，男）。从高中步入大学，最大的变化是“没人管了”，一切都是自由和开放的，自由选课、选社团、交友、发展爱好、安排日常生活，连上课学习似乎都是自由的。正是这样的自由度、忙碌感，考验着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大一下学期，对大学生活开始熟悉，也包括偷懒耍滑，老油条。一开始微积分课上听不懂，还会问同学，后面就慢慢不去问了，不认真对待了。上课开始走神，高中也走神，但是大学里的练习没那么多，没有规律的查漏补缺，走神的后果没那么快出现。看视频、玩游戏，其实也觉得无聊，但就

是没有动力学习。放纵自己的状态养成了，再想回到亢奋状态就很难”（受访者A，2018级，男）。A同学的经历是延毕生群体中非常典型的，金榜题名后的他们面对大学的挑战和诱惑缺乏目标、规划与自我管理，他们在获得电脑和手机的使用自由后无法自控，离勤奋学习以及学懂弄通渐行渐远。

（二）变“逃课生”：从翘课水课到学习掉队

高中时没有人会去怀疑课程的设置，然而到了大学，“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常有听说，延毕生们与课程不断作“斗争”。对于存在难度的数理化类必修课，他们提出质疑“为什么要学这么难”“学了有什么用”。对于难度不大的通识课，延毕生们又表示质疑，谓之“水课”。“水课”是网络热词，“水”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形容词，指“意义不大的课程”；另一种是动词，指的是“混过一节课”。“比如思修、形策、史纲等，有必要是有必要，但很占用我的时间，小组展示等形式很占精力。就是在水课上养成了‘水’的习惯，一般都是抢后排，于是上其他课也习惯了这样，就是做着其他作业，偶尔听课”（受访者B，2018级，男）。对于课上认真听讲、课后及时复习，延毕生们从来都是无心也无力，一旦有两三周没有坚持良好学习习惯，很有可能就此落下，不知不觉掉队。有研究发现，学习行为上存在“大二塌陷”现象，究竟是反映了本科生成长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还是制度设计缺陷，有待进一步去研究。

（三）变“学困生”：从期末挂科到退学警告

近年挂科率不断增长，大学生进校之初已经有所耳闻，然而在只是听辅导员提醒、听学长告知时，他们是怎么也不会相信挂科会落到自己头上。即便是出现课上听不懂、课后做不出作业时，他们仍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考前突击一下就不会挂科。直到期末考试答题以及考试成绩出分，他们才真正傻眼、吃惊、自责、怀疑自己无能，种种复杂情绪扑面而来。

不同高校都有学业警告，或称退学警告，指的是一个学期所获学分不足最低学分，则产生警告，警示该生学业出现问题。退学警告与学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例如该省“双一流”高校的规定，一次退学警告，需申请退学试读，连续第二次出现退学警告即退学。退学警告会正式通知学生家长，因此这能引起家庭与学生的足够重视。而退学警告几乎就意味着延毕。（收到退学警告时）“我觉得有很大可能会延毕，因为学业完成度不是很高，落下了很多课程，要短时间内补过来的话难度会很大。虽然不是很想这样认为，但是也是无法否认的”（受访者G，2019级，男）。

（四）缺师友交流：从热闹开放到孤独无伴

每个大学生所属圈子很多，有宿舍的、班级的、年级的、学生组织或社团，还有原来高中同学，种种圈子，看似可以自由结交朋友，其实大学生普遍觉得孤独，延毕生更甚，他们往往缺少同伴一起相约早起、相伴上课。正如F同学所说：“我缺少伴儿，自己没有找同学或朋友，喜欢独来独往”（受访者F，2016级，男）。因为大学里大家干的事不一样，选的课不一样，所以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比较有限，这也慢慢造成彼此联结不够紧实、不够固定，为个人自我安排的随意性、多样性、放纵性埋下了伏笔。当“精致的利己主义”遇上“内卷”文化，大学生之间少了一些纯粹的交友、交流，多了一些竞争的意味。E同学说的“看到别人很忙，早出晚归的，不知道忙什么去了，觉得他们好积极，好优秀”（受访者E，2017级，男），反映了这些

刚成年的年轻人之间的彼此疏离和互相比较，缺少坦诚相待。

此外，延毕生与大学各类教师也很少联系。“不像高中，老师和学生都是很熟悉的，想沟通也可以。但大学不一样，连老师办公室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会去问问题，交流感情几乎没有”（受访者B，2018级，男）。大学里，他们更多是习惯独自面对一切，很少积极主动地求教老师、求助学长、寻求同伴。

（五）缺家庭支持：从家庭骄傲到无脸面对

延毕生曾经也是家中的骄傲，收获了金榜题名的荣耀，当遇到挂科甚至退学警告，绝大多数孩子是不想或不敢告知家长。然而按学校规定，退学警告一般是要通知家长。学生无法面对家长，反映出他们的自我愧疚或羞耻。“延毕对我来说是很羞耻的。毕竟从河南一个小县城考到省府，从小就是家里的榜样，给家族弟弟妹妹怎么交代，各种羞耻、不安。我现在都不知道亲戚知不知道”（受访者A，2018级，男）。这些学生背后的家庭不乏中产阶级、教师家庭等，起初也是觉得天塌下来，家人的不解、责备，会让延毕这个事更加艰难。“他们一开始批评我不争气，毕业证都拿不到，后来也就理解我了，还反过来安慰、鼓励我”（受访者D，2015级，男）。很多时候，校方担心家长的责备可能加重孩子压力，会劝导家长不要责备孩子，家长往往会在老师劝导和自身消化后慢慢接纳现实，默默承受愤怒、失望、焦急等情绪，更多的是担心孩子想不开。“父母有些生气，也有些难过，这几年对我的期望也变得很脆弱，但最多的是他们会害怕，怕我自己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受访者C，2018级，女）。

（六）受朋辈冲击：从同学毕业到前路未卜

同年级的同学们集体毕业，成为他们的第一波现实刺激。“周边同学都忙着拍毕业照，找工作，我还在学校没地方去，就在宿舍待着，每天打打游戏，饿了就点外卖。有点伤感和失落”（受访者D，2015级，男）。毕业季加剧了延毕生的离愁、焦虑、迷茫。对于他们来说，本身就缺乏目标追求，而如今可怜到只剩下毕业的目标，即便是只求毕业都存在难度和超大的压力。“延毕很耽误人生，没想过毕业后干什么，就想着能毕业”（受访者D，2015级，男）。在对延毕生的访谈中，问及他们毕业后想做什么，多数的回答是“还没想好，先毕业再说”。对于就业，他们没有憧憬与期待，更加没有奋斗的热情，有的是对“延毕究竟有多少影响”的顾虑，对如何解答“用人单位对其延毕的提问”的担忧。“自己第一次经历延毕这件事情，所以不知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流程，对于毕业有怎样大的影响。也不知道在以后找工作、考研复试等一切面试中，万一有考官询问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答”（受访者C，2018级，女）。

四、本科生延期毕业的生成机理

本科生延毕现象表面上是延长学制，实质上是中学到大学转型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青年问题，延毕是一种无能、无力、无奈的结果。分析其主要的生成机理发现，这是在社会长期误导中掉以轻心、在高校自由模式中放纵自己、在学习困难中怀疑学业和人生、在成人世界的竞争挑战中措手不及而逐渐生成。

（一）社会误导：“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高考前，中学老师、家长、社会大众大多持有并传输给高中生这么一个观念：“考上大学就轻松了！”个别学生甚至抱着“考上大学后，再也不想学习”的想法。于是，这些学子拼尽

全力攻下高考，奔着“轻松”二字而去，进入大学后，要么热衷学生工作、社团活动，要么娱乐消遣、安逸享乐。“自己刚入大学时，对一切都不了解，很多都是听别人说的，大学混混就行，很容易毕业的。后面自己就产生了这种想法，开始和同学做些小生意，然后开始创业。随着自己越来越忙，学业就越来越放松，慢慢地就导致自己学分没有修够”（受访者D，2015级，男）。社会错误观念导致大学生进入大学后无法正确切换角色，没有做好从应试教育到自主学习转变的心理准备，缺乏有意识地从快节奏学习改变为持之以恒学习。

（二）高校空档：“大学生学业到底谁负责”

大学多元化的学生评价体系，实则加剧竞争。学生在全面发展的要求下无所适从，更在全新的学习模式下疲于应付学业。研究显示，大学新生入学以后最难以适应的是学习。学业一旦亮起红灯，即有可能陷入延毕的深渊。然而，大学的学业支持系统并不完备，甚至存在“空档”，即大学生学业到底由谁负责的问题并未厘清。任课老师作为专业教师，肩负科研任务致使教学精力有限，当课堂出现到课率低、抬头率低等问题时，任课老师不一定严加管理，可能将其归咎为学风问题，认为应由辅导员负责。而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辅导员，学业管理并非其本职，且人均负责200名左右学生，学生课表不尽相同，辅导员如何介入课堂开展细致的学业管理？而学校教务教学部门对于教学管理、教学质量评价存在局限，并且在教学资源拮据的背景下，想要通过对教师“施压”，推动教学策略、方法、技术的提升，恐难取得较好效果。因此有研究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制度无法为大学生提供学业上的个性化帮助和辅导。

（三）学生困惑：“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去学习”

部分大学生对于大学学习的认知存在偏差，没有端正学习态度，更没有树立勤奋学习的目标和信念。“大一上学期很挣扎，总算没有挂科。到了大一下学期，有点讨厌学数学，觉得有用，但又不是很有用，这一点到大三还没体验到它的用处，太抽象、太枯燥、特别难以理解，于是不可能兴致勃勃地学，无法集中精力听，听着听着就干别的事去了，写其他作业之类”（受访者B，2018级，男）。纵观延毕生在学习上的表现，似乎存在三大冲突：出现惰性不想学、出现玩性不爱学、缺乏技能不会学。惰性主要源自认知上不上心、不重视，行为上不肯多执行、多投入，别提弄懂学透，连接时上课、完成作业的基本任务都无法完成；玩性主要是放纵自我，贪图安逸享乐，沉迷打游戏、刷手机等舒适圈；学习技能差包括专业知识技能即学习基础差，与学习相关的可迁移技能如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差，以及与学习相关的自我管理技能如勤奋踏实的学习品质欠缺。

（四）家庭缺憾：忽视人格完善和情感交流

家庭教育总是难脱干系。很多家庭在保持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上并未做得很好，往往忽视对孩子人格完善的重视，也忽略与孩子间的情感交流，致使长久以来青少年的心理素质、自我意识没有得到很好培育。“我觉得我有性格缺陷，从小自卑，父母是安分守己做小生意的老实人，对我的关怀很少，都靠我自己调节，他们很忙，很少陪我”（受访者A，2018级，男）。同时，不少家庭没有教会孩子良好的能力和品质，包括如何心理求助、如何借助资源、如何面对挫折等。甚至，孩子对于从家庭中获得支持，都是存在顾虑的，例如B同学的情况在延毕生中十分常见：“到了大二上学期时（课程）越落越多了，干脆不想学了。我没有主动寻求

帮助，从小到大习惯自己解决问题。父母有关心过，但自己没告诉他们，怕他们担心。如果告诉他们了，他们会一直问你发生什么、发生什么，这个过程肯定会让我很焦虑，所以干脆不说”（受访者B，2018级，男）。

五、本科生延期毕业现象的防治策略

结合辍学理论模式和自我效能理论，笔者认为，高校与社会可以从学业系统、社交系统和自我效能三个维度采取措施，预防和减少本科生延毕现象。

（一）保障学习转型，促进学业表现

高校和教育者要建立和健全大学生学业引导与支持体系，保障学习顺利转型，促进良好的学业表现。（1）加强低年级学风建设和学业引导。对于低年级本科生来说，学风建设应为重中之重。在低年级还没适应高中到大学模式转换时，可以有过渡性的管理教育模式，借鉴高中管束性的管理模式，帮助大学生养成按时上课、下课、预习、复习、练习等习惯。通过生涯规划、培养方案解读、选课指导等做好学业引导。（2）加强学业支持体系与责任分工。需要梳理和明确高校内有关大学生学业支持和管理方面的职责与分工，高校各部门、教育者要各司其职，多管齐下，任课老师、教学管理部门、辅导员等多方联动，形成行之有效的学业支持系统，提升学业指导工作成效。（3）加强学业评价体系和预警机制。预警机制根据学生学习状况可以分为不同级别，如一般警告、退学警告、退学。根据学生入学以来的学习状况，适时发出不同级别警告，发现“不好苗头”及时亮牌，由警告的级别不同，给出学习具体建议，便于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并及时修正。

（二）增进社交文化，优化社交质量

高校要高质量提升社交融合系统，建设充满爱与支持的社交文化。（1）营造社交文化与交流氛围。心理学很多研究表明，经常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学生显得更加乐观与自信。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习惯在虚拟世界社交，缺乏真实世界的社交能力、社交机会、社交期待和获得感，这对于大学生健康成长是不利的。高校应在加强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上下功夫，从新生入学初加强宿舍、班团等的归属感及凝聚力，加强辅导员、班主任、本科生导师、新生之友等教师力量。（2）保障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稳定。大学的“走班制”，即大学生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文化的营造。因此，要适当保障低年级大学生上课教室的固定性、同专业学生选课的集中性，还要建设相对集中、统一的宿舍生活园区，创设相对便捷、稳定的大学生文化活动中心，便于大学生较为容易地开展社交活动，凝聚社交关系，形成社交文化，从而使新生能较快较好地浸润其中受得规范、引导和影响，获得一定程度的关注、关爱与支持。

（3）适当控制低年级学生社团活动。倡导大一新生每人加入的社团不要过多，这样既能保障大学生较好的时间精力，避免出现忙不应暇、主次不分的现象，又可缩小朋辈间的活动差异、作息差异、能力差异，减少朋辈比较产生的落差。

（三）提升自我效能，培育心理弹性

大学生要有自我觉察、觉醒和提升的意识和能力，做好自身应对大学挑战的准备。高校要设计和提供有助于提升大学生自我效能的机会和平台。（1）提升自我管理 with 生涯规划的能力。通过优秀学长分享经验，尽早传递给新生大学学习与适应的方法，如“只要吃早餐就不会挂科”

“离宿舍越远，离成功越近”等接地气的朋辈之间的经验、经历更容易被模仿和学习。通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综合素质能力提升等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生涯规划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实际社交能力等。（2）培育抗逆力，学会面对孤独。抗逆力是个体虽经历或正经历严重压力/逆境，但其成长并未受到损伤性影响，心理社会功能良好甚或愈挫弥坚。从高中到大学的环境变化对每一位大一新生来说，都是一种新的逆境。因此，家庭教育、中学教育就要有意识地帮助青少年提高抗逆力，包括营造充满关爱和互助的生活环境、寄予期望和支持的精神后方、参与实践的机会和锻炼的平台。而进入大学后，高校可通过增加校园文化活动、传授生活技能、提供关怀与支持、建立和表达高期望等方式，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抗逆力，提升大学生心理正能量。

立足当下，本科生延毕现象折射出青年成长诸多问题，如青年心理素质不够坚韧、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生活管理不够成熟，也暴露出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某些偏颇和忽视。展望未来，全社会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摒弃错误观念，改良教育观念，讲求科学培育，让教育之路上多一些爱与支持，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而持续努力。

（摘自《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大学生网络社交的危机检视、 泛起成因及消解

文 / 陈圣军 毕红梅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通信的社会化应用，网络以重构性姿态介入人们的生活，从时间和空间上根本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沟通方式，促使人们的交往方式从传统的现实社交转向网络社交模式，即在物理链路和数字技术搭载的网络空间中，基于社交软件进行的在虚拟社交群落中互动和交流的行为。目前来看，网络社交形式趋于多元，主要包括电子邮件、社交网站、即时通信、网络游戏以及影视音频等。这些新的交往形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网络社交的兴起为大学生提供了全新的人际交流和互动模式，但也造成了现实交往与网络社交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了大学生网络社交危机。因此，必须正视大

学生在网络社交中显露的问题，加大力量投入，引导大学生从“非正常”和“异化”的网络社交困境中走出来。

一、大学生网络社交的危机检视

网络社交已然成为当代大学生社会交往的新形态，对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产生积极作用，如促进了人际交往、满足了心理需要、提供了求知学习的新渠道等。但大量现象表明，过度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网络社交，可能引发个体消极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如逃避现实人际交往、沉溺网络信息消费、引发认知局限等。较之于网络社交的积极作用，大学生在网络社交中所产生的负面问题更值得关注 and 重视。

（一）网络圈层社交：引发认知局限

网络技术的发展既最大化地满足了大学生追求个性的诉求，又提供了精准的信息服务。但同时，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技术理性扭曲、操控和遮蔽，倒逼着大学生进入了一座信息交互相对狭窄的“孤岛”——网络社交圈层化。

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社交中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圈层化表征。所谓网络社交圈层化是指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基于信息获取定制化、个人社交圈子化、交互关系层级化而形成的一种仅在自己特定的社交圈层中小众化、垂直化进行信息传播、交互的交往状态和趋势。大学生正值观念觉醒、价值养成的“拔苗育穗期”，对于情感价值的认同和呼吁可谓更趋激烈，这种因“趣”成“圈”的圈层场域恰好迎合了其抒发情感、找寻归属以及身份认同的心理诉求和情感需要。因此，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社交中圈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圈层化中部分大学生“圈地自控”引发认知局限。在网络社交中，“由于圈层结构的存在，不同群体之间排斥对话和交流的情况经常出现，对‘他者’的定义和想象往往陷入‘非友即敌’的思维”。也正是囿于这种圈层文化所具有的密闭性和排他性的态势，部分大学生沉溺在固定的网络社交圈层之中，倾向于信任和吸纳自身所属社交圈的圈内人的信息，拒斥与“圈外”的“我们”和“他们”进行沟通和接触，对于其他异质性信息更是选择性接受或者直接忽略，久而久之，部分大学生便不自觉地陷入了“圈地自困”的社交场域。圈层交往场域是成员间基于共同爱好与价值取向构建而成的认同王国。长期生活在圈层交往场域中，大学生所浏览和获取的信息往往是同质化或单调重复的内容，不仅不利于完整全面地认识世界和探索新知，反而无形之中将自己困顿于一种单一的价值观之下，逐渐形成兴趣至上的思维惯性，引发主体的认知局限。而“当个人被禁锢在兴趣偏好的自我构建中时，好比作茧自缚，不知不觉中便会失去总体性的视野”。

（二）网络虚拟社交：弱化交往能力

“网络社交”作为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人际交往方式，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创设更优的条件、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又导致部分大学生热衷于网络社交的间接交流。其结果是现实交往的机会缺失，交往能力弱化。

网络虚拟交往是现实交往的补充和延伸。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的物质活动，与人物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其指认着人类交往是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统一。

和交织。尽管网络虚拟社交促使人们交往方式自由化、多元化，但网络虚拟交往仅仅是现实交往的补充和延伸。归根结底，网络虚拟交往始终是基于现实交往的一种技术物化的产物，网络虚拟交往终究代替不了现实交往，二者必须在虚实和谐中以满足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旨归。

但部分大学生的“网络依赖症”弱化了现实交往的意愿和能力。当前部分大学生为了补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人际互动的不顺和不适，打破了现实交往与网络社交的平衡，频繁选择通过网络社交的方式获得精神慰藉和身份补位，由此，患上了“网络依赖”症，沦为数字化的“单向度的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常常会选择逃避现实社会的“直接交往”，热衷于虚拟社会的“间接交往”；沉溺于“角色-角色”的符号化社交，拒斥“主体-主体、主体-客体”的面面对话；在虚拟空间中侃侃而谈，现实社交中却难以启齿。网络社交的虚拟人际互动，虽然可以给予人们一定的情感补偿，但不能也无法真正达至现实人的情感需要的满足。坦白地说，过分依赖网络的单维度社交是一种“病理性”的社交状态。它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现实交往的时间与精力，消减了现实交往的情感因素，导致部分大学生对现实人际交往逐渐失去兴趣，表现为现实交往的意愿降低、能力退化，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

（三）网络成瘾社交：消解自由和理性

大学时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他们对外部世界高度关注，求索、求知欲望强烈。因而，在网络交往中，大学生更加关注信息的摄取、浏览和传递，而大学生由于缺乏自我调节和管控的能力，往往沉迷于网络社交而不能自拔，导致网络成瘾社交。这不仅削弱了大学生交往的主体性，也消解了大学生交往的理性。

过度沉浸于网络信息消费，削弱了大学生交往的主体性。网络交往成瘾的主要表现就是信息消费主义。网络交往成瘾者不自主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高度关注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台的信息和链接。一旦有消息提示或者标识提醒，他们便会选择即刻点击和查看消息，不愿意遗漏和错过任何一条信息。网络交往成瘾者因为不了解自身的需求，只是在网络交往中频繁地刷新和浏览界面，看似是在自主地撷取信息、获取知识，实则不然。网络交往成瘾者越是时刻紧盯、不停刷新、频繁浏览网络信息，越是容易被“碎片化”信息所“奴役”，继而导致自我迷失和信息消费迷乱。有研究证明，这种高强度、高频率地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网络交往的行为，表征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这种“问题性使用促使个体产生强烈的动机浏览社交网络或与他人互动”往往是被动而非主动的，而在这种被迫交往中部分大学生会逐渐丧失自己作为人应有的主动性、自觉性。换句话说，沉湎于虚幻的网络交往世界中，不仅会致使个体自主性的消解，束缚了交往自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部分大学生的自律意识。

过度陶醉于网络社交平台，消解了大学生的交往理性。有别于传统社交软件功能的单一性，如今以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为代表的社交平台，涵盖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交等方方面面。为实现对大学生群体的争夺和占有，这些社交平台倾向于“‘短平快’的高频内容输出和‘酷炫美’的强烈视觉刺激”，使得部分大学生在不断被满足的视觉快感中乐此不疲地陶醉于“视觉盛宴”。“娱乐化”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社交平台充塞和弥散着大量庸俗、浅薄的内容，而大学生处在价值观形塑的关键节点，过度沉迷很可能会使大学生群体被不良社会思潮怂恿和魅惑。

稍有不慎就会在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辨别中迷失方向，失去交往理性。

二、大学生网络社交危机的泛起成因

网络社交在给大学生的交往提供社会便利和交往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形成了束缚和压迫，甚至造成了新形式的“殖民化”现象。这一现象的生发主要是资本逻辑、技术驱使和大学生自身情感需要共同造就的结果。

（一）社交欲望和个性需求的虚假满足

大学生群体因潜力巨大成为资本逐利和跃迁的不二选择。资本之手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持续挖潜大学生网络社交的需求和欲望，以精准化的信息投递方式满足大学生网络交往的个性需求，从而逼迫其陶醉其中，渐次沦为资本获取回报的劳动工具。

1. 商业化的手段持续挖潜社交需要

网络社交背景下资本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不断刺激和挖潜大学生群体的社交需要，激发大学生网络社交的欲望。一方面，资本逻辑不断利用爆料、猎奇和立新等营销方式博取读者的眼球。凭借“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庸俗图片”等泛娱乐化、大众狂欢化的内容，刺激受众的社交欲望，魅惑大学生抛洒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驻足于网络社交平台之中，以满足资本谋取“流量”、获得“回报”的逐利本性。另一方面，资本之手借助网络意见领袖和雇佣网络“大V”等营造社交舆论环境。在网络社交平台，意见领袖的言行举止深刻影响着其他群体并形成群体压力，推动和刺激群体间的互动和交流。大学生思想活跃，社会阅历浅，很容易受其蛊惑。殊不知，这种社交需要是资本为了逐利而伪造的虚假需要，“精神需求的创设本身就是对群体理智意识的抽取”，夺取了主体社交的理性与自由。

2. 精准化的投放迎合个性需求的虚假满足

商家通过信息垄断，掌握受众、控制资本和推销内容，并凭借着对信息的高效生产、快速传播和精准投放的效度操控，不间断地向网民精准投放碎片化、娱乐化社交信息内容。基于用户的浏览习惯、兴趣偏好以及阅读数据而精心筛选信息和内容，并借助算法技术实现精准投送和供给，使得主体徜徉于自己的“兴趣世界”中，钻进了以“趣缘”为半径的文化环境中，极大地满足了网络社交主体的个性化需求。显然，资本之手借助资本的力量以满足个性化社交需求为导向赢得了消费者的拥护。事实上，这种精准化的投放确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资本为了吸引用户，增加用户黏性，会持续性地高频率推送更加垂直化的内容以迎合大学生的需求，逼迫大学生逐步陷入资本打造的消费主义的“景观”，沉浸在信息“宅化”的交往场域，遭遇知识简短浅薄、思维固化狭隘、价值观单一的危机。

（二）交往关系和主体形象的网络依附

“‘技术的逻辑’有时可能背离人们的初衷，偏离预设的轨道，挣脱人们的控制，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反主体性效应”。技术在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其“自主的逻辑”也奔涌而至，使得人类在既“合理”又高效中被技术所宰制和异化。反映在网络社交中，技术通过交往关系的遮蔽、主体形象的抽象实现对大学生群体的支配和控制，使其依附于网络进行交往。

1. 技术对交往关系的遮蔽

网络社交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工具理性或理性的工具化对交往关系的遮蔽和掩饰。在网络

交往中，受制于二元论和工具理性，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被抽象和简化为人与“机”、人与“数据”的关系，甚至沦为“机”与“机”的物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原本社会交往中更为重要的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也在工具理性的支配和技术的加持下被机械式互动所替代，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交往关系被技术异化和遮蔽。这一现象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尤为突显，他们热衷和依赖通过网络技术在线上搭建社会关系，倾向于通过点赞之类的符号交流和文字交流等行为实现互动和沟通。不言而喻，这种极简化的方式为主体提供了便利，但也使主体因享受便利而产生了网络技术依赖，致使交往关系的建立服从于技术支撑逻辑。网络社交中的文字交流“所能够传达的信息量要比语言、表情和肢体动作少很多，仅坐在电脑前或者使用手机发文字信息的社交是贫乏的”。因此，网络技术不仅裹挟着大学生群体卷入了交往关系的认知误区，更使得他们忽视了对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维护和联络。

2. 技术对主体形象的抽象

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交往的空间被分化为缺场和在场两种形态。较之于传统的身体在场且身份在场，或是身体在场而身份缺场的原生交往形态，网络社交的语境中增添了身体实体缺场而身份在场的新形式的缺场交往。在网络缺场交往中，通信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人们的互动行为，互动主体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借助表情、图片以及文字等符号实现缺场互动，使得交往双方不得不借助符号的力量呈现存在方式，实现自我展示和印象管理。网络交往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化交往，“交往主体都是隐藏在文字符号背后的‘面具人’，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是数字化、符号化的存在”。网络交往中，不仅是交往主体被符号化，其形象也被赋予了符号化意义。这就意味着在网络交往中交往主体的自我形象不是直接性和实体性呈现，而是个体自我价值准则把控下的选择性表露。网络缺场交往能够实现主体形象自我重塑和自我呈现，这一点与大学生群体热衷于理想化印象管理的期望不谋而合。然而，就自我认知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在网络交往中往往会过度追求符号化、理想化的自我呈现，沉湎于网络社交场域中的自我，这不仅可能使大学生群体陷入自我迷失和自我认知偏差的窘境，还会使大学生群体淡化和遗忘了交往的本质和意义。

（三）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的需要牵制

大学生正处于思想和心理渐趋成熟，却又尚未成熟稳固的“尴尬”阶段；缺乏清醒的观念意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却又渴望情感归属、期待身份认同。而网络交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达对方的交往世界，能够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渴望却无法得到的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关怀的需求、社会认同感的需求等等”。故而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身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的需要牵制着大学生群体依附于网络社交，而由于自我调适能力不足以及缺乏价值引导，引发了大学生的社交孤独和自我认同焦虑。

1. 情感归属的强烈诉求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说，情感归属的需要是人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对获得情感共鸣与关怀的期许，这既是人类较为普遍的心理诉求，也是人类交往最基本的动机。无论是现实交往还是网络社交，人们都会有情感归属的需要。网络社交平台正是抓住了大学生群体在交往中获得情感归属的强烈诉求，进而使得大学生群体成为网络社交场域的主要参与者。情感共鸣和关怀依

赖于个体语言、行为等方式的表达和显露，语言文字、视频影像、图片声音等都可视为情感表达的行为，而每个行为都承载着主体的喜、怒、哀、乐等基本情感。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朋友圈、视频号等正是个体为获得情感归属所做出的情感表达，而他人的点赞、评论、留言等行为则是对主体的情感共鸣和关怀。这一点映射在大学生群体身上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诚然，网络社交平台不但为个体创设了情感表达的机会，而且为构建人与人交往的情感互动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正是在网络社交平台的助推和大学生群体情感归属需要牵制的作用下，大学生群体成为网络交往的铁杆拥趸，甚至整日萦绕在这种情感归属的循环之中。然而，这种渴求被点赞和评论的心理和情感期待，过分关注他人对自己的情感回应，一旦情感表达未能达到预想状态，大学生群体就会因此而产生落寞感和迷茫感。

2. 身份认同的迫切期待

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希望在群体性生存中获得自我确证和群体认同，如在生产劳作中的劳动认同、社会交往中的身份认同等。身份认同的建构需要在现实生活的交往中得到回应和确认，而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人们在网络交往中也能获得身份认同。当代大学生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获得身份认同的现象则更为普遍，他们在网络交往中通过表情包、网络用语等对话和沟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而组建和融入社交圈，在社交圈中获得身份认同和认可。网络社交平台的优势就在于能够组建大量由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组成的不同圈层，帮助有强化身份认同需要的个体寻找交往机会、搭建交往平台、免遭社会排斥。如此，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建构的身份认同在网络交往中可能被实现。这迎合和满足了大学生群体渴望通过聚合关联和自我匹配以获取身份认同的心理期待。在身份认同的情感牵引下，大学生群体游走于网络社交空间，通过大量的搜索、浏览行为加入和离开不同的社交群体，看似能够获得更多的身份认同感的行为，反而可能会滋生对身份的自我怀疑，由此带来自我认同的焦虑。

三、大学生网络社交危机的有效化解

对于网络社交，我们既不赞同像“卢德分子”那样一刀斩地反对现代技术的盲目做法，也无法接受像“阿什米人”那样拒斥现代技术的保守观念。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对待、综合分析、科学研判、合理引导，从而有效规避、妥善解决大学生网络交往的困境，助推大学生在网络和现实的人类交往双重维度中实现“虚实和谐”。

（一）加强规约和监管：净化网络社交生态

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捷和可能，同时引发了新形式的交往异化挑战和困惑。这些挑战和困惑表征的是“人与技术”或者说“技术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从表象来看是技术应用产生的技术问题，但其背后藏而未显的则是伦理问题，即技术伦理问题。因此，我们应借用伦理的手段规约和引导技术的向善向好、不伤害、负责任，把技术本身引向技术进步和社会和谐相协调的方向，即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就网络社交来说，社交软件和主流媒体在网络社交和信息供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其予以规约、治理和监管，势在必行。

1. 强化价值引导，规约社交软件积极参与网络的治理和建设

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并无善恶。技术与伦理之间发生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在于运用技

术发明的“人”。社交软件由于“利己逐利”的逻辑支配，往往会选择弱化和消解网络空间的公共利益指向。它们借助海量信息资源的占有和分布，以刺激性的信息内容吸引用户注意力，极限榨取“行为剩余”，达到收割流量的目的。这也是当前互联网平台充斥着大量媚俗、有害和虚假消息的动因所在。因此，一方面，积极导引社交软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取向和基本依归。虽然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可以负载价值。承认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技术-伦理”并非势不两立、不可调和。因此，我们可以发挥人在控制和支配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将社会文化价值取向、道德使命、伦理规范等负载于技术之上，最大限度地引导技术向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强软件的伦理研究，以满足人的主体性发展为着眼点，确保人与技术的共生。对于技术伦理问题的反思和讨论，实则是对“人”的问题的讨论，理应站在“人”的立场上，引导技术开发和运用兼顾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必要时用价值理性对技术的工具理性予以中和调节，以牵引其朝着“人性化”维度发展。

2. 增强媒体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播正能量的应有之力

一是牢牢把握主流价值在互联网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主流媒体作为主流价值传播的推动者，要敢于发声，及时亮剑，筑牢主流价值在互联网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二是提升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要始终坚守媒体职责和使命，在优质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发挥引导力、扩大影响力、树立公信力。三是增强主流媒体的吸引力。要以符合受众喜爱、易于受众接受、回应受众关切的话语和表达方式，正面阐释、纾解困惑，拨云见日。四是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建构矩阵传播格局，扩大主流媒体在商业平台中主流价值传播的影响力版图。事实上主流价值的传播需围绕认知主体现实生活的多种需求提供高质量认知和价值体验，方能引起用户关注，形成有效互动。因此，主流媒体的传播内容除了舆论导引和新闻传播之外，还应关注和着眼用户的休闲、娱乐、消费等“生活”领域，进一步扩展主流价值传播的主阵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给予正向信息的有效供给，使得正能量和主旋律的信息和内容充盈大学生网络交往场域。

（二）强化引领和驱动：满足大学生的理论需求和情感需要

总的来说，网络社交所衍生的诸多困惑源于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思想上的解疑释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看家本领”。由于人的思想意识性质结构由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构成，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力量亦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类。“由于真理是理性的对象，情感是非理性的重要对象，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理性的力量与非理性的力量，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力量和情感力量”。大学生对网络社交的沉溺既有包括认知、观念在内的理性因素的影响，又有诸如情感需要等非理性因素的促使。因此，我们应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和情感驱动功能，发挥真理（理性）力量和情感（非理性）力量，调节和规范人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思想引领、思想解惑、精神解忧、文化解渴和心理解压。

1. 发挥真理的力量，聚焦大学生理论的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力量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真

理引导、说服和征服学生，便是思想政治教育真理的力量发挥和彰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以实现思想引领，用透彻的分析解除学生的思想疙瘩以达到思想解忧；而且要以立论充实的话语支撑排解大学生的后顾之忧、走出精神沙漠实现思想解惑，更要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浸润实现文化解渴。具体地说，一方面，要帮助大学生更加理性地审视和反思网络社交中自我沉溺的“假”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深入阐释网络社交的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澄清交往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互动方式，应该蕴含着情感、人格的交流，体现着各自的主体性，而网络社交中所获取的人格是虚拟性的人格，一旦沉溺于其中，将会限制和疏远现实人格之间的体认。言及于此，就是要协助大学生由“被技术控制”转向“控制技术”的主体，使其意识到自身应在信息消费和网络社交中处于主体地位，涵养健康真实的网络主体、网络自我、网络人格。另一方面，要引领大学生走出网络社交的虚假满足。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存在论、实践论、本质论和发展论，引导大学生正确、理性地看待网络社交这一互联网行为，客观地对待网络交往中带有积极偏向的内容；帮助大学生回归人类交往的本真样态，体现人的实践状态，体会现实社会交往的归属感、幸福感、成就感、满足感，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

2. 发挥情感的力量，满足大学生情感的需要

从生理或心理层面来看，大学生更需要精神层面的交流与情感上的陪伴。从信息消费的角度来说，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渴望获取身份认同和定义，而信息消费成了其建构和确认身份的一种重要方式。从社会交往的层面来看，符号互动的舒适体验、低约束性的虚拟交往空间，最大化地迎合、满足了大学生的情感需要。既然情感需要是促使大学生从现实交往转向网络交往的重要诱因，那么通过其他方式满足和补偿大学生情感需要，无疑是引导其走向现实的、具体的交往的一种可靠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调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情感力量感染学生，辅以科学的心理辅助和心理健康教育实现心理解压；用明白、透彻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满足大学生的话语期待和诉求，满足其渴望被尊重、被认同的特殊情感需求，使得大学生从情感和内心深处体会现实交往中情感的力量，获得人生的启迪。

（三）激发自我觉醒和调适：增强个体的主体思维和交往理性

除去外在因素，个体的主体思维的衰弱和交往理性的缺失，也是大学生无法处理好虚拟交往和现实交往关系的重要缘由。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解放“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如果人的解放的条件是意识到“锁链”的存在并要求摆脱这种束缚，那么让大学生真正摆脱网络社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获得主体解放的路径便是个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调适。

1. 个体的自我觉醒

自我觉醒的关键在于提升理性认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自我觉醒并不会自发形成，而是需要教育者和他者的激发和引领，但终究依靠个体自身的自觉和自省。在此意义上，一方面，个体思想上要主动认识，时刻保持自身的理性和清醒。具体地说，在网络的空间场域中，用户看似主动地通过网络摄取信息和互动交流的行为，实则是算法精准推送下的被动选择。长此以往，个体将因为过窄的信息接受面，而造成思想的桎梏、视野的束缚、认知的固化。这

就要求个体在面对网络交往时，坚持理性思维，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网络社交应用是人为创造的为人的产物，应为人所用而不是受其支配和控制。另一方面，观念上要自觉调整，保持网络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虚拟社交成为现代人须臾无法脱离的社交方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虚拟社交和现实交往始终是不同的世界、互异的存在，这意味着个体须在双重维度中保持虚实和谐、适度张力。这就要求个体做好观念上的自觉调整，既要调整好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的维度转换，又要处理好网络与个人的互动关系，避免过度沉溺于网络社交和信息景观中，失去了“自我”。

2. 个体的自我调适

个体的自我调适是“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行为，这是专属于人的自我能动意识的体现。换句话说，个体的自我调适能力越强，其自主能动性也就越发明显，当然，其主体性也就越强。而主体性的增强，无疑是消解网络交往中的负面影响的关键环节。因此，一方面，个体要提升判断能力。所谓信息的识别和判断能力，主要指向的是能够“辨别真伪，有用、无用，以自身的主体性征服信息垃圾的包围，不致使人沦为‘数字化人’”的一种信息咀嚼和摄取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强自我的约束力。这里的自我约束力，即是指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要加强对自身思想、行为的规约和把控的能力，能够自我划定和规范行为的界域。总而言之，判断力的提升、约束力的增强，实质是让个体在网络交往中提升信息素养、注重自我教育、恪守理性思维、坚守底线思维，继而能够更加理性、慎重地参与到虚拟交往中，并在现实交往与网络交往互补中建构“全面发展”的自我。

（摘自《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社交媒体与女大学生的“理想美”建构研究

文 / 田甜

一、引言

“理想美”（beauty ideal）是指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群体性身体形象认同，它既由个体进行理想化构建，也是群体性的文化规约，而社会文化会通过影响个体对自我身体与他人身体的感知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理想美”的发展。当今社会，各大社交媒体持续不断输出的“理想美”概念，对公众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愈发明显。不同于高中阶段只关注学习，大学生拥有更多的社交需求与社交自由，作为“时代弄潮儿”的社会个体，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越来越高，对于当下的流行风向嗅觉也更为敏锐，能够更快地理解并融入时代潮流之中。“A4腰”“纸片人”“蚂蚁腰”“蜜桃臀”“芭比眼”等关于女性身材的阐释，在现今社交媒体上成为一种潮流，诸如“港风妆”“反手摸肚脐”“漫画腰挑战”等视频在平台上一经传播，就迅速引起现实中女性的追捧与效仿。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现在大热的社交媒体平台，既向使用者传播了美容美体信息，也成为用户释放自我、表达自我的舞台。女大学生时常以社会流行的审美标准来审视自己的容貌，对来自集体或他人给予自己容貌的负面评价产生焦虑情绪，进而出现时常检查和借助各类方法手段调整自己容貌的行为。在目前新的传播环境下，这些被高频使用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如何在女大学生群体中建立“理想美”形象并持续激发其容貌焦虑，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的父母就带我去苹果店买了全套的电子设备，因为高中一直在拼命努力学习，所以上了大学之后有种报复性玩手机的感觉。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课程比较多，而且刚进大学还是想好好学习的，所以也没有过多地关注互联网上的新闻，但是大三、大四之后，课都修完了，在宿舍就经常与舍友一起逛淘宝、刷视频。而且大三、大四的时候更关注穿衣打扮了，不像大一、大二那么稚嫩，就会主动地关注美妆博主、穿搭博主。她们总会实时更新最新款的妆容和造型，我觉得她们又美又飒，真希望也能像她们那样漂亮时尚。（访谈对象：ZXF）

传播内容并不是社交媒体输出“理想美”的唯一途径，其背后的技术加持也会加剧当代青年女大学生过分追求所谓的“理想美”。例如“美颜滤镜”所营造出的氛围感视频、“瘦脸瘦身”后获得的高赞视频等都会使用户迷失，久而久之使用者不满足于活在手机滤镜里，转而寻求现实医美整容的帮助。除此之外，现代互联网的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更容易将女性用户包裹在“信息茧房”当中，最直观的感受即当你点开一个美妆护肤类视频，在后续的视频推荐中该类视频占比超过六成，极易引起用户对该类别内容的沉浸式关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中的“网红”与传统媒体所塑造的明星形象不同，前者因为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容易被普通女性比照和模仿，而后者对于普通女性来说则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普通女性更容易被新型社交媒体塑造的“网红”形象影响，通过与“网红”的理想形象比较产生容貌与身材上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女大学生中更为普遍。大学作为自我身体意象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一个成年人正确认识自己、塑造“三观”的重要时期，因此，本文拟将在校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女大学生新型社交媒体运用与自身身体意象的关系，全面剖析社交媒体对女大学生“理想美”建构的传导机制路径。

一开始我只是关注了很多摄影博主，因为我本身是新闻传播专业，需要去学习很多拍摄的技巧，但是后来渐渐地我就会去关注他们拍的模特，很多都是小有名气的网红。我之前也是一直被人叫“小美女”的，也有很多人找我约拍，后来发现我总会不自觉地拿自己跟喜欢的摄影师拍的网红做比较，会模仿她们的妆造，买同款的衣服。现在大家不都开花呗嘛，我就会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用花呗去买化妆品、衣服鞋子和包。（访谈对象：WYQ）

二、理论视角与方法

（一）理论视角

1. “理想美”与社会文化理论：社交媒体构建的“信息茧房”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把社会文化视为社会中对人的认知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认知和知识本质上是社会大背景下互动的结果，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离不开特定文化背景下与他人及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是在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对“理想美”的研究无法脱离真实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既是由无数个个体认同组成的，同时也对每个个体认同产生影响。社交媒体作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主力军，其构建的“信息茧房”影响着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并通过不断的强化和加深认识，将个体的“理想美”变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理想美”。部分研究侧重青少年的身体自我与健全人格，认为社会文化环境中他人对个体的容貌关注与评价迫使人们深受他人审视的影响而关注自我的外表，从而推动自我客体化。

社交媒体通过搭建“信息茧房”，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世界，让青年大学生更容易陷入虚构世界的审美旨趣，降低了其对现实事物的了解能力和接触机会。社交媒体通过直播互动等手段，促使女大学生不断被“理想美”形象裹挟及吸引，情不自禁地参与形象塑造、模仿与改造之中，不断鞭策自己向“理想美”形象靠拢。

2. “理想美”与社会培养理论：“理想美”的内化

“理想美”首先是个别群体视域下的审美标准，经由社会文化场域下的社交媒体传播后，逐渐被该场域下的其他个体所认知进而认同，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审美标准。这一步骤即“理想美”的内化，即让个体接受所处环境中理想身体意象的标准和要求。这种内化行为往往表现为对外界“理想美”特征的偏好与自我理想化身体意象的改造，会对人们的认知与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正是基于社会文化理论下的模仿行为，主张社会公众会对特定场域中的各类事物、各个部分及各种关系形成共识，认为社会会在“共识”中维持稳定的生活与文化环境。其中，大众媒体负责广泛传播这种相对统一的观点，并促成社会群体对“共识”的接受。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塑造着影响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的“象征性现实”，通过某些倾向性在大众心目中描绘着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偏离的“主观现实”，“理想美”正是这种“象征性现实”的产物，因此对现实个体身体意象的认识与追求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些学者通过对女大学生的追踪分析，进一步阐明了社交媒体日益普及的趋势下，人们越发重视自身身体形象的对外展示，在与理想的身体意象比较中，个体将会不断强化自我对完美

形象的认知,即“理想美”内化。社交媒体中的“理想美”内化通过一定链路传递,因此具有自发性。

3. “理想美”与社会比较理论:由比较诱发的容貌焦虑

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在解释人的自我评价机制时,认为个人对于自己能力和观念进行自我评价的需要是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某些竞争行为的直接原因。该理论将个人评价自己的观念和能力的内驱力视为基本点,认为这种内驱力能为个人的行为带来明确的引导。上行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作为比较行为的一种,指的是人们将自己与能力和属性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一般认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个体为了寻找与他人存在的差距,达到自我进步的目的。在身体意象方面,上行社会比较则会以个体对“理想美”的追求形式呈现出来。在社交媒体“理想美”建构与女性容貌焦虑的传导链路中上行社会比较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目前研究倾向社交媒体对个体身体形象的引导导致了容貌焦虑的产生。在检验社交媒体与自我客体化的性别差异这一方面,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同个体身体形象的社会比较呈显著正相关,且女生更为突出。已有研究通过在社会比较中身体意象的相关变量探讨女模特形象对女大学生身体形象认知的影响,证明通过上行社会比较,理想的身体形象与外表满意度显著相关。

(二) “理想美”的建构与容貌焦虑

容貌焦虑的产生同个体的身体状况、心理情感、社会经历等内部因素及社会思潮、媒体媒介等外部因素息息相关。在青春期/成年早期的容貌焦虑同儿童期/青春期的负面经历相关,也同当前的社会交际相关。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交媒体通过建构“理想美”形象而引发的容貌焦虑现象日益受到关注。通过研究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的社会影响,学者发现传统媒介营造的身体形象加剧了个体对自身容貌的不满。除此之外,互联网的发展、新型社交媒体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影响,通过对青年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同个体对身体形象的关注呈正相关,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给青少年带来更多容貌焦虑的风险。这一容貌焦虑由线上延伸到线下,学者研究青少年离线和在线社交环境中容貌焦虑的相关性,发现二者作为协变量双向关联。自制力薄弱的青少年,很容易对互联网产生依赖,研究表明在青少年关注的社交媒体内容中,视觉传达占主导,因此他们更容易接触到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呈现的理想容貌形象;而这些流行的容貌形象同时加剧了青少年社交中的容貌焦虑,在这一传导链条中,女生、认为自己家庭收入低的学生、认为自己容易受到社交媒体影响的学生会产生更多的容貌焦虑。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社交媒体中的身材谈论既会直接影响大学生产生身材焦虑感,也可能通过自我客体化间接产生影响。在社会结构与规范性文化场域的限制当中,受到社交媒体建构的单一审美要求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青年女性更容易产生容貌焦虑。容貌焦虑是社会本格焦虑在社交媒体中的新形式,在网红经济背景下,碎片化信息催生出“快餐式”审美,也使得消费主义下的“理想美”身体形象绑架了社交媒体的审美话语权。

综上所述,伴随互联网的兴盛发展,社交媒体成为一种新兴交互方式。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社交媒体所塑造的“理想美”标准逐渐被广大青少年所接受,同时作为社交媒体的主要

用户，青少年更容易被视觉内容反复刺激，直到将该“理想美”标准内化为自己的审美标准，并且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客观条件与该标准相比较，最终导致个体产生容貌焦虑。目前的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社交媒体与身体形象的相关性，且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社交媒体用户身份性别等都是其影响因素，但大部分集中在社交媒体展现出的“理想美”身体形象容易导致个体对身体形象的偏离认识的问题上，对社交媒体如何建构“理想美”并持续激发容貌焦虑的完整传播链路、具体影响机制等问题尚存在梳理与探索的空间。本文拟从培养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不同维度阐释社交媒体与女大学生“理想美”建构的逻辑关联，揭示社交媒体在塑造、内化、引导女大学生“理想美”形成并激化女大学生容貌焦虑过程中的传导链路及影响机制。

表1 受访者信息

序号	受访者姓名	出生年份	年级	使用社交平台总时长/周	平时关注内容分类(按优先级)
1	CQZ	2000	大四	>35小时	美妆/美食/穿搭/护肤
2	WYQ	1998	研一	20~35小时	学习/穿搭/护肤
3	ZXF	2001	大三	16~20小时	美妆/护肤/健身
4	LBF	1998	研二	16~20小时	美食/穿搭
5	XJY	2002	大三	16~20小时	学习/美食/美妆
6	ZDK	1998	研三	<16小时	美食/护肤
7	WLQ	2001	大四	>35小时	电影/小说/穿搭/护肤/美妆/健身
8	HF	1999	研二	16~20小时	健身/美妆/护肤/穿搭
9	WYZ	2001	大四	20~35小时	学习/电影/健身
10	ZH	2000	大四	20~35小时	摄影/健身/穿搭
11	NN	2000	大四	>35小时	穿搭/美妆/健身/电影
12	ZJJ	2001	大三	16~20小时	健身/穿搭
13	LCZ	2003	大二	<16小时	护肤/穿搭
14	LSC	2002	大三	>35小时	动漫/电影/学习/美妆/护肤/美食
15	XZQ	2002	大二	16~20小时	美妆/护肤/穿搭/健身
16	TL	1999	大四	16~20小时	学习/穿搭/护肤
17	ZWH	1999	研一	16~20小时	摄影/绘画/健身/护肤
18	SYK	2000	大四	>35小时	电影/美妆/护肤/穿搭
19	WXY	2000	大三	16~20小时	美妆/护肤/健身
20	ZY	1999	大四	16~20小时	健身/美妆/穿搭
21	ZJR	2003	大二	20~35小时	小说/穿搭/旅行/护肤
22	ZWJ	1998	研二	>35小时	学习/美食/旅行/穿搭/摄影/美妆
23	SYJ	2001	大三	20~35小时	穿搭/护肤/美妆

(三) 实证访谈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深度访谈法。自2022年1月至9月，笔者将调研群体锁定为在校女大学生，并对其中23名自述出现容貌焦虑的女大学生进行了访谈。访谈样本中，大四年级和研究生的人数较多，分别占35%和24%，其次为大三年级，大一和大二年级的人数最少；接受访

谈的女大学生所学专业多数为人文社科类，占比超过50%，艺术体育类占比为34.9%，理工科类的人数最少。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观看短视频”（包括但不限于抖音、小红书等）的频率所占比例最大，为38.3%；在使用时长上，每天共计“31~60分钟”占比33.8%。在短视频内容关注点方面，时尚类和颜值类的内容在女大学生社交媒体用户中的关注度较高，分别占到61%和54%。在短视频和vlog博主里，演艺明星、网络红人、护肤彩妆类时尚达人和健身博主这四种类型的关注度较高，均在45%以上。遵循受访者意愿，本文对受访者的真实姓名均做了缩写处理，受访者具体信息见表1。

三、社交媒体凝视下“理想美”建构的传导机制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理想容貌、身材特征的有力宣传者，是影响女大学生身体意象的一个核心因素。在访谈样本中，超过半数的女大学生认为社交媒体宣传的“理想美”形象影响了她们自身的审美，过分追求“白幼瘦”，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极其不自信。

刚大一的时候，大家都用QQ，玩QQ空间，最多也就是用微信发朋友圈。到后来同学开始玩抖音，一开始是让我给她的作品点赞，我就下载了一个。再后来我自己每天也花很多时间去刷短视频，特别是大三之后我的学分基本都修完了，每天空闲时间很多，就像上瘾一样天天要刷短视频。大三、大四了嘛，除了学习大家就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脸和身材，我跟着抖音博主买了很多化妆品，但自己又不会化，觉得很浪费钱，自己化不好也不开心。上次寝室夜谈会大家聊起大一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不会化妆，军训晒得黑黑的但是很开心，感觉现在越关注自己容貌就越焦虑了。（访谈对象：CQZ）

调研与访谈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对女大学生容貌焦虑的影响遵循一定规律：首先通过身体意象的塑造框定一种或多种“理想美”的标准，接着通过广泛的传播链路和社会“培养”将其内化为个体“理想美”标准，并由此无形中诱导个体对自身与“理想美”、对朋辈的上行性比较，从而形成普遍的容貌焦虑氛围。

社交媒体中受人追捧的女性形象普遍符合“理想美”特征，女性使用社交媒体的频次越高、时间越久，对于其创造的“理想美”认同度就越高。短视频中的女性形象多展现为妆容精致、身材火辣、皮肤无瑕等，女大学生长期被这种审美和流行趋势“洗脑”，会将社交媒体所创造的“理想美”转化为自己的观念，并影响自己对身体和容貌的看法。

（一）因“塑造”而趋同：社交媒体形塑社会“理想美”标准

社交媒体不断通过内容输出形塑社会“理想美”标准。从身体意象出发，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会形成一套基于“美”的认知与评价标准。“理想美”可以视作社会文化理论下对身体意象“美”的集中提炼，它不仅是个体心中对良好身体形象的追求，更是某一社会文化赋予身体的理想标准，规范着身体“美”的状态。

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在公共生活中建立起了新的交流空间，借助社交媒体，符合大众审美的身体意象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大超出此前所有时期，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搭建的信息内容观察到更能满足大众心理的身体意象，并对不同的形象进行评价，从而天然选出代表社会群体心理、反映社会对身体要求的内容。因此，社交媒体环境催生了社交媒体用户对个体身体形象的关注与对符合大众审美的身体意象的追求。

社交媒体塑造的审美标准难以脱离社会属性，一般认为，“理想美”传播的主要媒介是广告和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传播链路让更多个体裹挟进大众媒介形成的“理想美”标准中。此外，社交媒体的交互性让“理想美”在形成标准上更快速鲜明，也极大地鼓舞了个体通过容貌的改变换取社交媒体上的关注与赞同。而事实上大部分大众媒介呈现出的“理想美”标准都是难以企及的，同“理想美”的差距感反而加剧了人们对身体意象的追求和个体容貌的改造，进而提出更高的“理想美”标准。

我在宿舍刷短视频时，可能因为大数据检索到我是女生，推荐里总是很多护肤美妆类的视频，在遇到自己感兴趣的妆容的时候，我会认真看完这个视频并在第二天去尝试，但是经常化得很难看，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感，会觉得自己不如博主好看，对自己的容貌自卑。（访谈对象：LBF）

（二）因“培养”而困扰：社交媒体内化个体“理想美”标准

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理想美”标准加速了个体对此“共识”的内化。社交媒体在塑造了社会“理想美”标准后，通过其影响力将该标准不断扩散，最终被社会个体所认可并内化为自己的审美标准。例如，当今大众媒体不断宣扬着“理想瘦”的理念，通过拍摄手法、后期PS等手段向社会大众展示被处理修改过的所谓的“完美”女性形象，并由于其在形成“理想美”上的强大影响力，使得这种刻板印象被当作美女的一致标准而被公众认可；而女性在“理想美”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身体形象的个人意志便愈发强烈，从而对“理想美”进行模仿。

从身体意象出发，对“理想美”的模仿学习往往难以脱离个体生存环境下“理想美”的普遍性，其中，大众媒体负责广泛传播这种相对统一的观点，并促成社会群体对“共识”的接受。培养理论主张社会公众会对该社会中的各类事物、各个部分及各种关系形成共识，实现社会生活稳定的基础正在于此。社会传播则负责传达这种相对统一的观点，大众传播相较于宗教传播和教育传播，更利于把内容一致的信息广泛地传达给社会整体。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中教育和宗教作用”。培养理论同时点明了传媒向社会传播的“象征性现实”与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其具有的倾向性的可能影响。“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扩展了身体意象的传播链路。网络大众媒介呈现的多元性、开放性为内容呈现提供了更多通道，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从文字到图片到视频的更迭中，人们的互联网感官不断受到新的刺激，在海量信息的挑选中，只有能带来更多冲击的内容才能脱颖而出。在中国，社交媒体行业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在社交媒体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身体凝视也加剧了国人对“理想美”的追求。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丰富多样，集合内容类型风格丰富，而精致容貌和理想身材往往能使相关内容从平台媒体中脱颖而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社交媒体用户同时作为内容的消费者与创造者，很大程度上愿意去迎合大众媒介传播的审美评价体系。当人们长期暴露在社交媒体对身体意象规约的氛围中时，更容易形

成集体性的审美共识，并通过评论、弹幕等即时性交流方式表达出来，建立起以身体意象为核心的互动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理想美”逐渐内化于女大学生脑中，她们逐渐将社交媒体营造的“理想美”标准作为自己的审美标准。

我平时经常刷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有段时间常常因为上面的内容感到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或是自卑。在这些平台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评判“美女”的标准产生：天鹅颈、A4腰、蝴蝶背、体重不过百……博主们带着tag发自己化完妆、精修过的照片，被网友们奉为“美女”并形成一系列成为“美女”的标准。与此同时，便会发现自己的朋友圈包括身边的朋友之间越来越多人开始容貌焦虑或身材焦虑，靠整容、节食减肥等方法向“美女”的标准靠拢，包括我自己，虽然相对比较理智但也常常会感到自卑或烦恼。即使在前段时间宣扬抵制容貌焦虑的阶段，也会有很多博主一边戴美瞳化伪素颜妆一边高呼“与素颜和解”营造素颜美女的人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我们普通人的容貌焦虑。（访谈对象：XJY）

（三）因“比较”而迷茫：上行社会比较引导“理想美”追求

“理想美”标准被大众普遍认可并内化后，个体必然会衡量与之差距并进行比较与模仿。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带来了天然的社会比较场域，在青年女大学生的使用过程中，社交媒体引发了相较于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下更为突出的“比较”现象。社会比较理论在解释人的自我评价机制时，认为个人对于自己能力和观念进行自我评价的需要是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某些竞争行为的直接原因。该理论将个人评价自己的观念和能力的内驱力视为基本点，认为这种内驱力能为个人的行为带来明确的引导。上行社会比较作为比较行为的一种，指的是人们将自己与能力和属性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一般认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个体为了寻找与他人存在的差距，达到自我进步的目的。在身体意象方面，上行社会比较则会以个体对“理想美”的追求呈现出来。

当代社交媒体大体从三个维度通过“理想美”概念加深容貌焦虑的实际影响：第一，社交媒体平台的交互属性对平台的用户提出了展示一定个人信息的要求，当社交群体中部分成员展示出了自己的身体形象时，难免会给接收到相关信息的成员带来更多“比较”的欲望和对自己身体的关注；第二，互联网平台的“眼球导向”使得理想的身体形象更容易在众多信息中脱颖而出，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浏览信息流时，人的眼睛天然更容易被符合理想的身体意象抓住，因而人们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主动接受“理想美”形象信息；第三，当基于身体形象的“比较”发生时，往往是社群中的个体自发的、无意识的行为。青年女大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很容易受到理想身体意象相关内容的影响，从而产生焦虑心理。

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团体中的个体具有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从中确定自我价值的心理倾向。个体在社会比较中的方向分为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在社交媒体平台“理想美”的影响下，女大学生对于容貌形象通常进行向上比较。社交媒体平台为用户提供了海量多样的信息，包括个人经历、图文、视频等，为社会比较打下了基础。女大学生关注的女性博主形象多为一种美貌的、纤瘦的模特形象，相较于现实中的女性容貌与身材都更加精致完美，通过这种向上比较，女大学生通常会产生对自己身体形象的不满。

社交媒体平台营造的社区氛围让大众审美成为网络身体意象的“标配”，并进一步潜移默

化地影响了大众对身体、外貌的判断，使个体难以正确评价自我的身体形象，也更容易产生落差感与焦虑感。社交媒体在身体意象上的审美标准相较于古代“环肥燕瘦”的固定标准显得更为宽容与多元，实际上却没有减少对身体的约束。无论是皮肤的无瑕、妆容的精致还是身形的纤瘦匀称，这些标准看似更为广泛多元，却都在社交媒体的逐层渲染中被放大而最终难以实现。社交媒体的审美塑造是建立在人际交往中的，视觉化冲击容易造成隐性比较，即在不同审美主体之间形成个体间的互相对比，个体不自觉地认为对方的外貌更为理想化，从而产生焦虑感。进一步来看，复杂的审美标准也使得在整体之下的局部被不断放大，个体可能会因为身体形象的具体部分而出现消极情绪。

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下载抖音、小红书这些的，但是我的室友们经常在寝室群里分享各种美妆瘦身的视频，我不下载就会显得很不合群，而且她们会一起买那种“辣妹装”或者是好用的护肤品，感觉我不跟着买就会被排挤。在我下了这些APP之后，我自己就会刷到美妆护肤健身的视频，会不由自主跟着模仿，去刻意地减肥，去学习各种化妆技巧，我们宿舍都不约而同地每天上秤好几次，夜间熄灯聊天的内容也多跟自己的肤质体重有关，感觉整个宿舍氛围越来越焦虑，甚至有暗中的攀比，这种感觉有时候让我很讨厌。（访谈对象：ZDK）

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比较”催生了“模仿”行为。例如，当社交媒体在展示一位女性瘦身成果时，除了展现其容貌身材的巨大变化，还会隐喻该女性因为瘦身成功而收获的人际关系、工作、生活上的各类回报。而当其他女性接收到类似的信息后，便会产生“如果模仿此类瘦身行为，也会得到类似回报”的想法，进而产生模仿学习的行为。曾有针对美国大学女生的媒介消费和饮食紊乱频率关系的研究指出：大众媒介为年轻女性提供了获得纤瘦理想体形的手段以及采用极端节食方法的动机和指导。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学习个体和模仿目标之间仅存在较小的差距，通过一定的付出可以缩小差距甚至持平或超越，媒体对女性群体的此类影响则可被判为积极。但如果学习个体和模仿目标之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差距，此类影响必然是普遍而消极的。当今大众媒体上展现和宣扬的女性通常具备无瑕的脸庞、远低于健康生理指数的身材，给人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完美形象。这种“完美”女性在媒体上频繁出现，但与社会上普遍的女性形象又有着巨大差异，很容易造成一般女性个体产生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等负面的身体意向。

在小红书平台的热点榜单上，近乎所有内容都可视为典型的身体意象审美输出，评论区中表达肯定、赞赏的言论是主流，更有用户表示羡慕，并在讨论中交流分享经验。从社会学习理论出发，人们通常会留意并仿照有吸引力的他人的行为，同时对该行为进行学习，这是一种间接经验的学习。青年女大学生在社交媒体的浸染下，容易受到相关内容的鼓动，从而提升自我改变身体形象的意愿。社会学习理论说明，发生频率越高的事情，被他人模仿学习的可能性就越高。例如，现实社会中的女性群体倾向于瘦身、减肥等行为就与大众媒体频繁地宣扬以瘦为美的观点有着紧密关系。

我在刷微博或小红书的过程中，常常会看见博主分享自己的美妆技巧、穿搭单品以及减肥瘦身食谱或训练计划。这些博主往往会被人们评价为美女，通过其他帖子也不难看出她们的生活往往幸福美满，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时知道她们分享的有些内

容并不适合自己，也会因为对她们的状态的向往而想要去尝试。但大多数情况下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以我自身而言，有些妆容和穿搭风格并不适合我的容貌和身材，甚至会对我的形象产生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产生自卑等负面心理，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正常生活。（访谈对象：WLQ）

（四）因“氛围”而焦虑：“理想美”持续激化容貌焦虑

社交媒体与大众思潮的影响力共同营造了对所谓的“理想美”狂热追捧的氛围。女大学生的容貌焦虑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经历了“理想美”的形成、集体性审美共识的内化、上行社会比较的引导等阶段后，社交媒体交互性特征、大众消费主义思潮也会为“理想美”扩散推波助澜，进一步激化青年女大学生容貌焦虑。

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链路，间接增强了审美标准的社会影响力。当前环境下，身体意象标准的多元化并不能消解人们对“理想美”的追求，相反一定程度上迫使人们不断改变自己的身体形象以迎合社交媒体平台上最新的潮流风尚。如在小红书平台2021年审美趋势上，“有效主义”和“氛围美人”高居榜首，前者指的是以结果为导向省略烦琐的形式感的有效化妆、穿搭，后者则指通过改变外在的修饰及细节、在视觉和气场上给出和谐舒适的观感的妆容方式，二者从不同方面给人们提出了“理想美”要求，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容貌焦虑。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为身体意象审美标准的形成、传播提供了公共空间，在平台的运营逻辑下加剧了个体改变身体形象的意愿，甚至通过算法推荐直接为个体提供了改变的通道。平台内容呈现的拥有毫无瑕疵的面庞、难以企及的身材等身体形象，通过反复暴露的形式扩大理想身体形象与一般身体形象的差距，在全社会营造出焦虑氛围；社交媒体使用者积极迎合“理想美”，在平台上发布个人积极良好的形象，同时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进一步推动了社交媒体环境中“理想美”的竞争。可以说，社交媒体带来了社会系统性的外貌焦虑风险。

除此之外，大众消费主义思潮让“理想美”的消费成为可能。许多头部美妆或者穿搭博主积累到一定的粉丝数量后，都会开始接相关产品的广告，发布诸如“好物推荐”等主题的视频。用户在观看此类视频后，会产生“使用相同产品就能变得和博主一样美”的错觉，进而产生消费冲动，引导观看者进行消费正是美妆护肤产品商家希望的结果。同时，许多医美商家也瞄准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电商红利，据统计，2018年增长速度最快的医美项目是面部年轻化项目，如光子嫩肤、热玛吉等光电美容类，其增长速度超过90%。在头部美妆护肤视频博主里，“抗初老”“抗衰”等话题占据了半数以上，伴随着“90后”迈入30岁行列，医学抗衰将取代一部分高端保养的市场，许多医美商家与博主进行合作，吸引其粉丝进行医美产品的消费。

社交媒体所塑造的“理想美”固化了当今社会的审美标准，并通过短视频的形式一步步内化于女大学生身上，同时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走向共谋，使用户逐渐迷失在社交媒体所营造的消费主义氛围中，共同推动了“容貌焦虑”氛围圈的扩大。

我一直对自己的皮肤状态很不满意，小的时候爆痘没忍住喜欢用手挤痘痘，现在脸上留下了很多痘印痘痕，怎么化妆都遮不住。再加上自己以前也没怎么注意护肤，虽然只有20岁，脸

上已经有法令纹鱼尾纹了，现在一照镜子就很焦虑。在抖音上看到学校附近有个美容机构推出了光子嫩肤套餐，我节衣缩食了几个月，用花呗分期付款去体验了几次，每次做完感觉好像皮肤是变滑变白了不少，但是隔几天就恢复了原貌。我现在更焦虑了，看到抖音上推出的特惠套餐就很心动，但我知道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真不知道应该继续坚持做还是赶紧停止。（访谈对象：XZQ）

四、结语

当代社交媒体基于经济利益的运营逻辑实质上形成了贩卖单一“理想美”标准的场域，这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未完全成熟阶段的青年大学生而言无疑会产生对身体意象认识偏差的风险。以小红书、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流量至上”的大众媒介环境中打造着“理想美”标杆，而平台的盈利数据也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容貌即流量”。社交平台热搜内容近乎全都是典型的“理想美”形象，即使我们不主动关注妆容、医美等与容貌相关的内容，系统随机推荐的条目也会优先考虑能够带来更多流量收益的“理想美”信息。大学生长期处于“理想美”的网络场域，很容易陷入算法推荐带来的“信息茧房”，在社交媒体的审美幻象中形成失调且同现实脱节的审美旨趣。处于社交媒体营造的“理想美”空间中，身心尚处于逐渐成熟阶段的大学生需要被关注和引导。面对大众媒介铺天盖地的“流量密码”，大学生群体如何在全新的社会文化体系下减少对自我身体意象的过分关注、规避容貌焦虑的陷阱，是一个值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共同思考的话题。

本文基于现实，从社会文化理论、社会培养理论与社会比较理论入手，深入剖析社交媒体是如何通过形塑社会“理想美”标准，进而将这种所谓的“理想美”标准内化于女大学生个体，再由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茧房”引导女大学生不断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最终持续激化当前女大学生容貌焦虑的传导链条。社交媒体作为“理想美”形成的幕后推手，在逐步打开市场通道、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主动承担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责任，帮助青年大学生多元理解、内化、追求“美”的内涵及实质；全方位育人是高校的第一使命，面对目前社交媒体环境中潜藏的偏好“理想美”的社会思潮，可以在加强大学生知识学习、科学研究的同时，通过理论课堂阐释、一线心理辅导等手段，以及依托文体赛事及校园文化活动等平台，开展有益于提升大学生审美情操、丰富学生精神文明生活的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全面提升广大青年学生“美商”；而青年大学生认知与自控能力的提升才是避免“理想美”带来容貌焦虑的关键。青年女大学生作为深受容貌焦虑影响的特殊个体，应厘清自身容貌焦虑的诱因，从扭曲的审美观念、“颜值经济”的裹挟及医美行业的宣传炒作中抽离，除此之外，进一步加强自身认同，跳出“理想美”标准的桎梏，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我，在真实世界中体会成就感与获得感，实现审美观的转变与自我身体形象的悦纳。

（摘自《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